臺大歷史學報第 49 期
2012 年 6 月，頁 65-109

BIBLID1012-8514(2012)49p.65-109
2011.11.28 收稿，2012.6.1 通過刊登

各行其是：「東南互保」與「兩廣獨立」中之各方政治籌謀

陳　學　然*

提　要

本文以庚子拳變為背景，觀察遠在倫敦的英國內閣如何在追求國際均勢格局下踐行其對華政策，同時探討駐華英官對中國政局的相應舉措。有關論述將以英人如何與東南督撫籌議「東南互保」、策動「兩廣獨立」，以遂其控制東南中國之目的為中心，觀察駐華英官、港英政府在推行有關計畫時，與英廷對華政策不協調之處。

基本上，在審視中國大局或維護英國整體利益方面，英廷與駐華英官因所處位置不同而有差異，後者在與東南督撫交涉過程中，輕忽既定對華政策的具體落實情況，反而更多地表現伺機以動的政治籌謀。他們雖飽受在地危機感，但同時又因危見機，在未鄭重看待李鴻章等督撫的政治態度下各行其是。鑑於中國即將被瓜分，使他們急欲早著先機以建功績，在擴張轄區影響力或干涉中國主權上，比英廷的步伐走得更急更遠，最後逼使英廷率先打破刻意經營的東南和局，使英國在新世紀的遠東外交戰略處於被動位置。此外，就在英官大力擴張勢力範圍之際，孫中山也懷著自身政治理想與籌算投入庚子年（1900）波譎雲詭的政治浪潮，周旋於各派之間，為開展革命事業尋索機會，反映其掙扎求存的努力與嘗試。

關鍵詞：東南互保　兩廣獨立　李鴻章　孫中山　港督卜力　莎侯　霍必瀾

* 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助理教授
香港特別行政區九龍達之路；E-mail: hokychan@cityu.edu.hk。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一、庚子危局與英廷的對華政策
二、駐華英官與東南督撫交涉
三、督撫政治態度與英軍強行進江
四、「兩廣獨立」的政治算計
五、英人與李鴻章、孫中山的互動
六、各謀其利
七、結語

一、庚子危局與英廷的對華政策

關於庚子危局與英廷的對華政策，美國歷史學者萊特（Mary C. Wright）指出，「歷史上很少有一年像 1900 年之於中國那樣富於關鍵性」，又說：「1900 年是中國近代歷史上最重要的轉捩點。」[1]的確，1900 年，即過去慣稱的庚子年，因為義和團運動引致的各種局勢變化，使中國歷史產生劇變。滿清皇朝經此年衝擊更為奄奄一息，西方列強以撲滅「拳亂」為藉口，在中國的政經、軍事擴張動作頻頻。借由大理寺少卿兼中國電報局總辦盛宣懷（1844-1916）當時寄給慶親王奕劻（1838-1917）、軍機大臣榮祿（1836-1903）、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王文韶（1830-1908）的通電，中國局勢危如累卵，可見一斑：

> 守徑者，煽動土匪，群起焚掠。各國以平亂救使為名，添兵約十餘萬。德王誓師，必欲毀京師。各國則云，如各使聚殲，無論如何，乘輿必追躡，政府必償命，宗社必滅裂，不復以公法待我。竊思亂黨力攻使館，是其勢成騎虎，必欲逼朝廷與各國結不解之仇。[2]

1 〔美〕萊特女士，〈辛亥革命的本質〉，收入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第 3 輯，頁 31-34。

2 盛宣懷，〈盛宣懷致奕劻、榮祿、王文韶電〉（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七日〔1900 年 7 月 13 日〕發自上海），收入陳旭麓、顧廷龍、汪熙主編，季平子、傅德華、吳民貴、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拳變甫發生，各國即以救使為名，行擴張之實。德皇因其公使被殺，命令軍隊攻伐中國以為報復，同時又難掩將軍事版圖從當時的勢力範圍山東擴展至中國其他地方的意圖，而俄國繼在東北屯兵十萬後，也有進一步作為。不過，與守土有責的東南中國督撫一樣，不欲華北局勢魚爛甚或波及東南局勢的，還有英國政府及其駐華使節，他們擔心在中國經營數十年的龐大利益將隨著拳亂擴散和列強軍事擴張而土崩瓦解。

此前，英國是列強中在華占有最多利權的國家，長江流域一帶的東南中國為其勢力範圍所在。如何保護這些利益不受侵犯，並在未來繼續維持既有特權，或在執行門戶開放政策時，與列強保持均等商貿機會，都是英國政府內閣（為便於表述，以下簡稱「英廷」）上下急需謀劃的對策。

英國在庚子前數年對華態度，受其自身國勢及全球戰略重點分布左右，基本上趨向被動和守成。由於英國深陷非洲波耳戰爭（1899-1902）泥淖，與俄國、法國關係處於對立狀態，與德國亦不見和睦，日本徘徊於英、俄之間，美國此時則不願過問歐洲事務。英國在國際上處於孤立無援狀態，面對列強在華勢力擴張問題時，既無餘暇、也乏足夠資源應對。[3]英國首相兼掌管外交部的索爾茲伯理侯爵（Robert Arthur Talbot Gascoyne-Cecil, 3rd Marquess of Salisbury, 1830-1903，簡稱莎侯）及其同僚，於 1895 年便已開始採取較為保守的新對華政策——「於競爭年代捍衛大英帝國在壟斷年代（in an age of monopoly）獲取的東西」，[4]即不再積極、主動攫取新領土或爭奪新特權，避免引發列強在中國進行新的軍事競逐和領土擴張。

不過，英國雖反對列強瓜分或占領中國領土，但不排除於均勢格局

陳宗海編，《義和團運動：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頁 123。

3 王曾才，〈英國對華外交與門戶開放政策〉，收入氏著，《中英外交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9），頁 192-193。

4 Leonard Kenneth Young, *British Policy in China: 1895-1902* (Oxford: Clarendon, 1970), p. 1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出現變化時作出箝制行動。1897 年的一項外交照會說明，英國不主動占領中國的領土——「除非俄國與德國公然併吞中國部分土地」。[5]故當德國在膠州灣建立煤港、俄國在華北海域集結艦隊，英國便以在長江沿岸如舟山群島建立同類港口，用以保持均勢並制衡。1898 年的香港殖民地擴址移界事件，即是英國為對抗法國占據廣州灣的報復行動，使自己在這種機會均等、利益同沾的對華政策中，隨著新利益版圖的順勢擴大，繼續成為獲益者。[6]為了維持這一對華政策，使在華列強勢力均衡，莎侯曾坦承對此頗感厭煩（distasteful），[7]致使他不欲英國在中國有任何行動，以免引起列強不安本分之舉。

英國既不欲主動對華有新的單方面擴張，同時也不願列強在中國實施其他新的軍事行動、爭奪領土或重新分配利權。英國議會於 1898 年 3 月 1 日通過一項重要的對華政策議案，聲明「保持中國領土獨立，對於英國商貿和影響極為重要」。[8]時任英廷副外交大臣的寇松（George Nathaniel Curzon, 1859-1925），在議會中進一步說明英廷對華政策「必須是盡可能長久地防止中國分裂」，並反對外力分割中國領土或犧牲中國任何部分領土的「獨立」。[9]但在整體國力難與列強周旋的情況下，英國基本上無法獨力阻止列強蠶食鯨吞中國領土。這一現實局限，使英國考慮放棄行之有年的「光榮孤立」（Splendid Isolation）政策，[10]轉求與

5 Minute on Memorandum by Bertie of 23 Dec. 1897, F. O. 17/1330. Cited in L. K. Young, *British Policy in China: 1895-1902*, p. 53. F. O. 為英國外交部檔案 Foreign Office Files 簡寫，館藏地為英國國家檔案館（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6 王曾才，〈英國對華外交與門戶開放政策〉，收入氏著，《中英外交史論集》，頁 100-105。

7 L. K. Young, *British Policy in China: 1895-1902*, p. 49.

8 原文是 “That it is of vital importance for British commerce and influence that the independence of Chinese territory should be maintained.” Cited in Philip Joseph, *Foreign Diplomacy in China 1894-1900*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28), p. 254.

9 原文為 “opposed to the alienation of any portion of Chinese territory, or to the sacrifice of any part of Chinese independence.” Cited in Philip Joseph, *Foreign Diplomacy in China 1894-1900*, p. 255.

10 「光榮孤立」指英國自 19 世紀晚期奉行、不與任何國家結盟的外交政策，藉此保持行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新興強國「折節」相交。

1898 年 5 月，殖民部大臣張伯倫（Joseph Chamberlain, 1836-1914）毫不諱言指出，鑒於俄國崛起及英國在華利益即將受到挑戰，英國必須放棄孤立政策，並與同種族的撒克遜後裔美、德二國結交。只有尋找同盟、尋找夥伴，才能抗衡在中國急速膨脹的俄國勢力，使「門戶開放政策」（the policy of the open door）及「貿易機會均等」（equal opportunity for trade）政策續得維繫。張伯倫強調，這種作法的目的在於保障英國「民族生存的極為重要利益」。[11]

上述一切都建基於維持列強的均勢發展，只有透過相互制衡才能維持一個穩定、和平、有秩序、獨立又領土完整的中國，而這樣的中國才最符合英國當前及往後利益。英國於是期望能與美、德結盟，制衡俄國、法國在遠東一帶擴張勢力。這一期盼隨著 1900 年義和團事件爆發而變得更為殷切，但在急切尋求盟友的同時，了解自身限制的英廷不願主動與其他國家發生軍事衝突。借用張伯倫之話就是：「必須阻止主戰分子驅使我們同時與全世界發生爭執。」（We must not allow Jingoes to drive us into a quarrel with all the world at the same time.）他認為要切實執行門戶開放政策，且與競爭者（rivals）在均等貿易機會下保持良好互動。[12]正因如此，向以沉著穩健著稱的莎侯、張伯倫，在庚子年才會審慎應對下屬增兵中國東南的籲求，詳見後述。

1900 年的前兩、三年，正是列強勢力在遠東大舉崛起之際，中國成為各國政經、軍事、外交角力的競逐舞臺。中國飽受列強欺壓多年，拳變爆發後，排外風潮席捲全國，列強紛紛以保護在華使節安全及利益為藉口，於原本占據的利權基礎上加大擴張步伐。譬如德國之於山東、日

動自由。詳見王覺非，《近代英國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頁 679。

11 張伯倫的原話是 “those interests which are so vital to the security of the existence of the nation,” *London Times*, May 14, 1898, cols. B, c, d, p. 12. Cited in Philip Joseph, *Foreign Diplomacy in China 1894-1900*, p. 320.

12 *London Times*, May 14, 1898, cols. B, c, d, p. 12. Cited in Philip Joseph, *Foreign Diplomacy in China 1894-1900*, p. 3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本之於閩廣、俄國之於東北，以及法國之於西南中國及廣州灣等等，拳變成為他們進一步擴張的契機。在時任英國駐華公使竇納樂（Claude Maxwell MacDonald, 1852-1915）的一封電文裏，顯示美國、義大利、德國等列強在 1900 年 3 月便以保護己國在華利益為由，紛向京津要塞大沽炮臺集結軍隊。竇納樂要求莎侯敦促英廷作出相應軍事行動，他說：

> 為了保護英國傳教士及其他利益，這些利益遠遠超過了其他國家的利益，我謹要求派遣女王陛下的兩艘軍艦前往大沽。[13]

然而，拳變之急激，竇納樂本人在 6 月身陷險境，被拳民圍困於北京東交民巷的使館區。

至此，英國過去苦心維持的均勢格局為之瓦解。不但如此，長江流域為英國在華利益的心臟地帶，英國在其地的勢力範圍和相關利權也面對以下兩個挑戰與威脅：第一，拳民的排外運動即將擴散至東南中國，目的在趕走所有外國人；第二，列強將以保護各自僑民及既得利益為由，剿滅拳民，陳兵東南。

當竇納樂被拳民圍困而生死未卜時，英國駐上海代總領事霍必瀾（Pelham L. Warren, 1845-1923）成為英廷了解中國局勢的重要聯繫者。霍氏在已經無法與清廷交涉，且英國努力扮演均勢平衡者角色受到衝擊的情勢下，6 月 14 日請示莎侯，希望他批准駐華英官結合擁有軍事實力的中國東南督撫，以便化解「長江流域的任何騷亂將會造成巨大的損失」的危機。[14]同日，他又積極地與其他在華英國使節互通消息，並致電英國外交部陳述訴求：「極力主張保護我們在長江流域的利益。」[15]不過，英廷此時更為關心華北亂局，尤其緊盯著俄國、德國的勢力擴張步伐，故未有即時大舉出兵東南中國的籌算。

---

13 〈竇納樂爵士致索爾茲伯理侯爵電〉（1900 年 3 月 23 日發自北京），收入胡濱譯，《英國藍皮書有關義和團運動資料選譯》（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 9-10。本文其餘關於庚子年間英國駐華使節與英廷之間的通電，未註明特定出處者，均輯錄自《英國藍皮書有關義和團運動資料選譯》裏的英國外交部檔案。

14 〈霍必瀾代總領事致索爾茲伯理侯爵電〉（1900 年 6 月 14 日發自上海），頁 41。

15 〈代總領事霍必瀾致代總領事法磊斯電〉（1900 年 6 月 14 日發自上海），頁 14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二、駐華英官與東南督撫交涉

隨著局勢惡化，義和團有向南擴散跡象，中國勢將掀起激烈排外運動。清廷此時已然群龍無首，各種負面消息使派駐中國的英國官員（下稱「駐華英官」或簡稱「英官」）憂心忡忡。霍必瀾、英國駐漢口代總領事法磊斯（Everard Duncan Home Fraser, 1859-1922）等人加緊與英廷聯繫，密切注意華北局勢發展和列強動向。英廷雖然未有大規模駐軍行動，但也在 6 月中旬進行兩手準備，一方面密令海軍部審時度勢，嚴密監視中國局勢變化，如一旦察覺全局崩潰，務必要趕在任何外力攻占舟山和南京要塞前先發制人，維護既得利權。[16]另一方面，英廷也於 6 月 15 日批准霍必瀾與東南督撫磋商的「互保」政策，藉共同維繫長江流域秩序，以「保護英國在長江的利益」。但在這些基礎上，英廷只「派遣一艘軍艦前往南京」，用以向東南督撫踐行「保證他們在維護秩序時將獲得英國的保護」的意願。[17]

在這一年與霍必瀾交涉的東南督撫分別有時任兩廣總督的李鴻章（1823-1901）、湖廣（同時又稱兩湖）總督張之洞（1837-1909）和兩江總督劉坤一（1830-1902）。此外，與他們聯手制外的還有上海道臺余聯沅（?-1901）、盛宣懷、榮祿、王文韶及署理山東巡撫袁世凱（1859-1916）。對這幾位東南督撫而言，如何穩守未受拳變影響的東南中國，不受列強侵犯，確為當務之急。盛宣懷致奕劻、榮祿及王文韶的電文指出「各疆臣達變者，聯絡穩住，暫保疆土」，提示了在外疆臣與朝廷內臣共許之「東南互保」計畫登場的目的與原因。[18]對於英國與列強而言，

16 Foreign office to admiralty, secret, of 13 June 1900, F. O. 17/1440; Cited in L. K. Young, *British Policy in China: 1895-1902*, p. 134.

17 〈索爾茲伯理侯爵致霍必瀾代總領事電〉（1900 年 6 月 15 日發自外交部）、〈海軍部致駐上海高級海軍軍官電〉（1900 年 6 月 16 日發自海軍部），頁 42-43。

18 盛宣懷，〈盛宣懷致奕劻、榮祿、王文韶電〉（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七日〔1900 年 7 月 13 日〕發自上海），收入陳旭麓等主編，季平子等編，《義和團運動：盛宣懷檔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保持東南和局也是他們在拳變初興時的共同想法，因為他們的軍隊此時均集中於華北一帶，東南若亂，則其僑民的身家性命安危、商業經濟利益一時之間也得不到保障。這對擁有沿江主要利權的英國而言尤為重要。基於此，英國除了一再宣稱維持中國主權獨立及領土完整外，也著手推行維持東南和平的策略。

英國的倡議得到德、美、日諸國和中國東南督撫的認同。究其原因，實源於諸國不欲中國的主權及領土因華北拳亂而分崩離析，讓華北利權的主要控制者俄國趁機壟斷東南中國利權。這一政策尤與美國「中國門戶開放政策宣言」最為呼應。美國因較晚介入中國利權爭奪，希望在已為列強把持的中國領土開拓機遇，主張中國門戶開放、自由貿易，使各國在華商業機會均等；而欲使機會均等，則其前提必須保持中國主權獨立與領土完整。[19]於是，美國這項最初發表於 1899 年 9 月的政策宣言，於翌年 7 月 3 日被再度宣示。美國此舉可謂甚為符合英廷當前的對華政策。正如論者所言，莎侯「堅信當時最危險者係俄人之野心，而非中國之內亂」，這使英國與美國、日本「接觸頻仍」，為在華商業利益和經營多時的政治利益達成共識——「尊重中國的完整，絕無其他野心」，目的所在，就是迫使俄、法作出同樣聲明，讓列強形成莫敢先發的互相制衡均勢。[20]

英、美、日諸國主張保持中國主權獨立及領土完整，同時亦不欲中國內部秩序更加紊亂，有關共識成為「東南互保」得以產生的國際背景。對於一眾負有守土之責的督撫而言，他們並不認同清廷與各國為敵的對策，更不願東南中國遭受兵燹拳禍而使中國亡滅。他們認為東南兵力用以「彈壓內匪，尚慮不給」，如「輕言戰守」，造成的各種惡果必定危困京城，東南亦必定「自將不支」。但要使東南中國安穩，就必須「一

資料選輯之七》，頁 123。

19 李國祁，《張之洞的外交政策》（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0），頁 175、185。

20 李國祁，《張之洞的外交政策》，頁 176-17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面議和，一面自清內匪不可」，惟如此，或可以「保存宗社、疆土」。[21]後文將會談及的李鴻章嚴詞拒絕英人留其在粵之訴求，堅持北上與列強就全域和平談判之安排，其實就是督撫們共同協商的救國之策。

承上，列強競逐但又求均勢發展的態度，和東南督撫亟欲維繫東南中國平穩的要求，成為「東南互保」條約得以面世的核心因素。1900 年 6 月 15 日，莎侯接受霍必瀾的建議，向張之洞和劉坤一保證，英國可提供兵力維護長江沿岸秩序。[22]張、劉鑒於英國此時在國際上仍有一定實力，與之合作，可避免列強以剿滅拳亂為名大舉揮兵南下的危機；其次，英國既已經營華南多年，必有保護既得利權之心，借其力量便可震懾德、俄槍炮。張之洞、劉坤一等認為：

> 蓋長江商務英國為重，各國覬覦已久，懼英而不敢先發，英亦慮各國干預而不敢強占，以啟各國戒心。在我正可就其所忌而羈縻牽制之。……此實委曲求全之策。[23]

待幾位東南督撫與英方經過多次意見交換後，終達成「東南互保」初步共識。以英方為核心的諸國領使，與盛宣懷、余聯沅等人於 1900 年 6 月 30 日在上海舉行會議，制訂《保護上海長江內地通共章程》九款草案、《保護上海租界城廂內外章程》十款，[24]透過互保而各取所需：對內共肅拳亂，保障商教不受侵擾以及一切涉外人員安全；對外則杜絕列強蠶食鯨吞，使利益版圖免遭重新劃分的危機。但此項合作計畫推行並不順利，列強間互不信任，英官與督撫間各自不同的籌謀算計，均使決策難以落實執行。

---

21 盛宣懷，〈盛宣懷致劉坤一、張之洞電〉（光緒二十六年六月下旬〔1900 年 7 月〕，發自上海），收入陳旭麓等主編，季平子等編，《義和團運動：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七》，頁 145-146。

22 〈索爾茲伯理侯爵致霍必瀾代總領事電〉（1900 年 6 月 15 日發自外交部），頁 42。

23 劉坤一、張之洞，〈會銜電奏〉（1900 年 6 月 26 日發自江寧），收入苑書義等主編，《張之洞全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第 3 冊，卷 80，頁 2151。

24 參李國祁，《張之洞的外交政策》，頁 155-158；盛宣懷，〈盛京堂來電〉（1900 年 6 月 27 日），收入苑書義等主編，《張之洞全集》第 10 冊，卷 235，頁 804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張之洞雖然與英國合作，但他希望英艦只集結於吳淞江口，不得駛進長江，避免列強在敏感時期以此為藉口，逼使中方給予同等特權。他的構思，究底而言，乃藉集結於江口的英艦抵擋列強引兵犯江，同時又不至於激發中國民憤或「驚慌」、「猜疑」，使排外浪潮火上加油。張氏認為有關安排是「鎮靜密防」之上策，正所謂：「吳淞外英艦甚多，英艦不進，他國不敢。」[25]張氏有鑑於列強彼此間矛盾猜忌的心態與本質，故施展此「羈縻牽制」之策，使之相互箝制抗衡。

當然，本求東南和局的英廷，基於合作之共同意願下，自然接受張氏之要求。[26]另一方面，督撫們也很清楚，英軍如要執意入江，則別國軍隊也將隨之湧進，遂有張氏明言不為後果負責的陳詞，[27]而這正是英廷必須小心並正視的。故張之洞提出的要求，不為英廷上下反對，應在情理之中。但是，隨著東南局勢惡化，及生命財產受威脅的恐懼感，使在地駐華英官的精神壓力日漸加增。他們在 1900 年 7 月初陸續向英廷報告：「榮祿報導北京處於無政府狀態」，[28]或袁世凱已受端王命令，率領一萬八千名精兵占領南京，「無政府狀態將擴大到全國」。為此，霍必瀾於 7 月 5 日要求英廷派遣「一支十分強大的軍隊」，用以支持當地督撫對抗即將崩壞的局勢。[29]在同一天，霍必瀾再次致電莎侯，明確指出不只是他們，長江流域的其他各國「所有領事」均為不日即將席捲東南中國的排外浪潮作好準備，紛紛「向他們的政府發出如下電報」：

---

25 張之洞，〈致江甯劉制台〉（1900 年 6 月 18 日），收入苑書義等主編，《張之洞全集》第 10 冊，卷 234，頁 7993。

26 〈代總領事法磊斯致索爾茲伯理侯爵電〉（1900 年 6 月 20 日發自漢口）、〈外交部致海軍部函〉（1900 年 6 月 20 日英國外交部）、〈代總領事霍必瀾致代總領事法磊斯電〉（1900 年 6 月 16 日發自上海），頁 46、47、150。

27 相關言論節錄如下：「由於各國軍艦進入長江而引起的任何騷亂，其後果不應由各總督負責，除非各國軍艦進入長江一事曾徵得他們的同意。」載〈羅豐祿先生致索爾茲伯理侯爵的照會〉（1900 年 6 月 29 日收到），頁 121。羅豐祿（1850-1903）時為中國駐英公使。

28 〈代總領事霍必瀾致索爾茲伯理侯爵電〉（1900 年 7 月 4 日發自上海），頁 65。

29 〈代總領事霍必瀾致索爾茲伯理侯爵電〉（1900 年 7 月 5 日發自上海），頁 1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局勢極為嚴重，義和拳運動正在發展；如果天津的聯軍不能制止它，那麼，它將擴大到華中和華南，並成為一個全國性的運動，結果將驅逐或殺死內地的所有外國人，而且使外國貿易遭到徹底毀滅。[30]

這樣陳述的目的，無非是向英廷施加群體壓力，讓倫敦高層了解東南中國即將成為國際大戰場。各國為了應付拳民南下，正積極部署陳兵上海和實施搶占東南中國利權的行動。霍必瀾不願英國在軍事形勢上落後於人，故積極籲請倫敦撥兵增援，但其訴求未獲莎侯即時應允，原因是「長江已有十三艘軍艦」；他轉而安慰霍氏，「當有軍艦可供調遣的時候，兵力將得到增加」。[31]其實，莎侯不願即時增兵東南中國，除了該地局勢未如華北嚴峻外，也與可供調派的軍力有限有關。正如前述，英廷此時仍深陷波耳戰事困境，短期內無法立即在中國投入更多軍力。莎侯在一封致中國海關總稅務司赫德爵士（Sir Robert Hart, 1835-1911）的電函裏，談及與日本洽談軍事合作原委，不諱言指出：「由於距離太遠，我們不能夠迅速在該處投入大量部隊」，而他也認為英國在華兵力已基本足夠，固有部隊也可以「做我們所能夠做的一切事情」。[32]

進入 7 月中旬，英廷收到愈來愈多來自東南中國的不利消息。霍必瀾為了加強遣軍救援要求的說服力，7 月 14 日作出「強烈」的派兵建議，希望「有五百名騎兵、一營炮兵和兩千名步兵」能夠在香港或威海衛隨時候命——並「在得到通知後八小時內動身前往上海」。為了有效說服倫敦落實派兵方案，霍必瀾首先在電報中勾劃出難以收拾的圖景。他這樣陳述：

> 毫無疑問，義和團運動正在擴大，並且可能在全國發展成為中華民族反對外國人的暴動。

---

30 〈代總領事霍必瀾致索爾茲伯理侯爵電〉（1900 年 7 月 5 日發自上海），頁 68。

31 〈索爾茲伯理侯爵致代總領事霍必瀾電〉（1900 年 7 月 6 日發自外交部），頁 69。

32 〈索爾茲伯理侯爵致懷特赫德函〉（1900 年 7 月 10 日發於外交部），頁 125。按：莎侯所說的「距離太遠」，可能是指從英國本土，又或者是從印度、甚至是南非諸地抽調部隊前往中國。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今天，從漢口、湖南、溫州等地傳來了不好的消息。上海的失陷將對外國的貿易和影響造成無可彌補的破壞，因為上海是福州以北全中國的航運和貿易基地。海軍和志願兵不能夠固守上海防止一切可能發生的事情。[33]

7 月 17 日，霍必瀾再向上司指出，除了廣西、山西、陝西、河南、湖南、湖北等省巡撫「現在都已宣布贊成起事」外，與英國合作抱持游移態度的張之洞也可能被「捲入這個洪流」。[34]霍必瀾接二連三的電報，無不強調義和團運動已在迅速蔓延，各地官員也已經加入排外行列。這種結果無異於說明「東南互保」條約已失效，英廷苦心維持的均勢局面或盼望實現的和穩大局不復存在；英國目前亟需採取強有力的軍事行動，否則隨著東南督撫在此全國性排外活動中失勢——甚或變節，英國將喪失占領或控制東南中國的機會。屆時，列強將以清除排外勢力的機會，瓜分東南土地。以上種種跡象驅使霍必瀾等人相信：英國若不把握先機，迅速派駐重兵鎮守長江，則經營多年的利權和勢力範圍可能不保。當然，這種思維反映了霍必瀾早已把「東南互保」的精神與原則置之不顧。

除了上述消息外，讓在華英官乃至英廷不安的，還有列強在亂局中已嚴重威脅到英國的本身權益。他們獲悉美國——這個本來主張中國門戶開放、維護中國主權及領土完整的友好國家，已積極介入長江流域事務。他們注意到：美國商界與劉坤一聯繫，正在進行陰謀策劃削弱英國勢力的行動；上海的美國亞洲人協會（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鑒於形勢而籲求美國政府派遣軍隊進占上海。不僅如此，受到北京大屠殺的傳聞所致，長期擔任中國海關總稅務司的赫德爵士生死未卜，這消息使各國、特別是美國，開始過問這個由英人長期把持的要職繼任人選。於是，一個關於重新安排該職位繼任者的「陰謀詭計」（intrigues）的消息不逕而走。在華英官與英廷均十分警覺，也十分在意這個一直由赫德

33 〈代總領事霍必瀾致索爾茲伯理侯爵電〉（1900 年 7 月 14 日發自上海），頁 130。
34 〈代總領事霍必瀾致索爾茲伯理侯爵電〉（1900 年 7 月 17 日發自上海），頁 13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占據的要位的未來去向。[35]

7 月 27 日，霍必瀾再與南京領事聯名致電敦促英廷，提出「保衛上海的問題」。其中，為了促使英廷向上海增兵，他們不無偏頗地上報一項籲求：「請派部隊。關於人數，總督（按：指劉坤一）任您酌定。」[36]然而，有關通電所示實非東南督撫本意，此乃霍必瀾避重就輕的條陳。正是這一關鍵但又不盡真實的消息，既使督撫們在大軍壓境下憤怒不已，也使英廷往後因出兵登陸而感懊悔，詳見後述。

在此必須指出的是，霍必瀾等人如此汲汲於催促倫敦派重兵入江，除了保障包括他自己在內的英人身家性命外，背後更隱藏著深遠計畫。這些計畫很可能是莎侯、張伯倫等人不曾籌謀的，又或者是他們在與列強小心翼翼交涉的當前所必須反對的，這就是華南英官單方面加緊策動的「東南獨立」計畫，最終目的在於使英國長遠占據東南中國的一切利權。關於這一點，將可以從後續的論述中清晰看到。正因為霍必瀾等人要實現此項計畫，才有英人聯合華南內部各派地下勢力，並使之與官府共謀大事之方略。譬如，他們意識到活躍於東南中國的維新派勤王力量與革命派革命力量是華南區域長治久安的阻礙，如能策動上述兩派與當地督撫聯合，則可操控東南局勢。

就在這一局勢不明而列強瓜分中國聲勢大漲之時，霍氏等人支持康有為（1858-1927）、唐才常（1867-1900）陣營策動張之洞據湖廣獨立的嘗試，與策動東南督撫脫離在朝親俄主流政治力量的努力若合符節。7 月 24 日，主政東南海關系統的安格聯（Francis Arthur Aglen, 1869-1932，時任江海關稅務司）致中國海關駐倫敦辦事處稅務司金登幹（James Duncan Campbell, 1833-1907）的信裏，清楚表明他們策反劉坤一的想法：「英國現在有一個很好的機會從內部重建一個中華帝國，以南京為核心。只有英國能辦到這件事。」這樣做的目的只有一個，就是繼續保

35 Warren to Salisbury, tel. 36A and 49 of 11, 16 July 1900, F. O. 17/1427. Cited in L. K. Young, *British Policy in China: 1895-1902*, p. 174.

36 〈代總領事霍必瀾致索爾茲伯理侯爵電〉（1900 年 7 月 27 日發自上海），頁 14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障英國在華中、華東、華南的利益，使「別國在長江不能做的事，英國能夠做到」，並且「不讓別國進來」。[37]

不過，策動劉坤一的兩江獨立、張之洞的兩湖獨立，乃至港督卜力（Henry Arthur Blake, 1840-1918）策動李鴻章據兩廣獨立的計畫，似乎都不易得到對「好戰分子」保持警戒的英廷支持。故英廷在庚子中後期，既禁止卜力扣留李鴻章（見後文詳論），後亦與張之洞聯手鎮壓唐才常十萬自立軍起義。[38]蓋在排外運動高漲之際，英國對長江流域的任何動亂始終極為敏感，保持均衡穩定的局勢才是英廷最想見到的。但英國派軍登陸上海的行動卻是外交策略上的嚴重失誤，導致列強軍隊集結東南中國，英國優勢一夕殆喪。英方未如思考其他決策時保持冷靜，最後只能無奈地坐看事態發展並努力修補。

三、督撫政治態度與英軍強行進江

英廷高層收到駐華英官先後傳來中國情勢緊急的電報，再加上 7 月 27 日獲知中國督撫「同意」讓英軍進江的消息後，在 8 月 15 日簽發了登陸上海的軍令。但正如前述，霍必瀾所謂「請派部隊。關於人數，總督任您酌定」一語，與事實不符。這話有意渲染督撫接受駐兵人數所表現的聯英親英態度，並且強調督撫如何與清廷離心離德。霍必瀾 6 月 29 日即曾電告倫敦云：「李鴻章同長江總督一起，已同意不再承認北京政府。」[39]如此報告李氏及其同僚的政治態度是偏頗的，他們不承認臺前的端王載漪（1856-1922），不等於不承認背後的慈禧太后（1835-1908）。

37 〈1900 年 7 月 24 日江海關稅務司安格聯致倫敦金登幹函〉，收入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海關與義和團運動》（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頁 78。

38 〔美〕史扶鄰著，丘權政、符致興譯，《孫中山與中國革命》（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上卷，頁 159。

39 〈代總領事霍必瀾致索爾茲伯理侯爵電〉（1900 年 6 月 29 日），頁 59。作者按：本電函未註明拍發地，但應為霍氏工作的上海。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英官對中國局勢的判斷，可能是基於情報失誤、誤判時局所致，但更根本的原因是在地英官為了擴展政治利權及管轄界域，而向遙遠的上司傳達不切實的情報。正當東南督撫緊密地暗自商討連串收復局面大計時，[40]英官卻向英廷報告督撫們有意脫離清廷、更張中國政體的籌算，試圖說服英廷主動配合督撫的「籌劃」，並趕在列強前派兵掌握變局。他們的連番敦促，是站在殖民者角度或帝國主義者身分上的深層政治籌算，試圖在亂局中占盡先機，引兵深入長江內陸，奪得沿江軍事控制權，進而達到制內、排外的目的。基於英官的這種心態和目的，督撫們在維護自身國權前提下釐訂的各種合作策略，也就不易得到他們的正視和尊重。

霍必瀾一方面未如實地把中國督撫的合作意願轉呈英廷，也沒有鄭重看待英廷的對華政策。英廷也從與中國駐英公使羅豐祿的交涉過程中，對在華官員傳遞的信息有所保留。就以登陸上海英軍人數來看，英廷與英官之間的意見就很不一致，關鍵在於中國督撫到底能夠容許多少英軍登陸。英官與中國督撫的認知有出入，霍必瀾等英官希望有一支強大的軍隊在上海登陸，但羅豐祿向英廷轉呈劉坤一的電報卻明言「希望登陸的部隊限於很少的人數」，否則「將引起很大的糾紛，並刺激其他國家採取同樣的行動」。[41]

其實，在 8 月 18 日英軍正式登陸上海之前的兩個多月，[42]英廷、英官與中國督撫間就為駐滬軍隊人數多番交涉。這個問題一直困擾著英廷與中國督撫。首先，督撫們不願多見英艦入江的意願是清晰的，只能保留「照常遊歷亦不過一二艦」的固有立場。劉坤一、張之洞都主張限制

40 盛宣懷，〈盛宣懷致奕劻、榮祿、王文韶電〉（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七日〔1900 年 7 月 13 日〕發自上海），收入陳旭麓等主編，季平子等編，《義和團運動：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七》，頁 123。

41 〈索爾茲伯理侯爵致代總領事霍必瀾電〉（1900 年 8 月 10 日發自外交部），頁 169。

42 目前仍未見英軍登陸上海確切日期的紀錄，然據西摩電文推算，應是 1900 年 8 月 18 日。西摩電文稱：「部隊將於明天開始在這裏登陸。其餘三千人將從香港前來。」見〈海軍中將西摩爵士致海軍部電〉（1900 年 8 月 17 日），頁 18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艦隻數目，恐怕「多則驚擾地方」，故將此意通知霍必瀾及其他駐東南英國領事，還特別囑託霍必瀾將此主張電告英國政府。[43]然而，霍必瀾等英官鑒於形勢發展所需，在 7 月中下旬呈報倫敦，要求向上海大量增兵。不過，霍必瀾提呈的大量增兵方案，讓本來對「好戰者」心存警戒和有所保留的莎侯感到疑惑，他在 7 月 27 日的覆函中質問霍必瀾：

> 嘎仕禮將軍（按：英國派駐中國的陸軍司令）的電報說：由於和您及高級海軍軍官商議的結果，需要一支三千人的部隊防守上海，而且您認為，此事可與兩江總督協商。您在 7 月 7 日的電報中報告說，那時總督們並不盼望有更多的部隊到達。自那時以來這方面的情況是否發生了變化？目前三千人的部隊登陸能否得到他們那方面的完全同意？[44]

基於對霍氏呈請有所猶豫，英廷在同一天另派海軍中將西摩（Edward Hobart Seymour, 1840-1929）「親自調查」，欲藉其專業操守和知識制定派兵方案，並著其結合實際情況重新評估霍必瀾的報告，尤其是要核實劉坤一是否曾經同意英軍登陸，若同意，則此舉到底會否進一步釀成排外起義的風險？莎侯還以嚴厲的口吻要求西摩，必須在「莽撞行動和後悔莫及的惡果」中小心權衡每個部署；又嚴正敦促說：「女王陛下政府政策必將取決自你報告上的觀點，以及哪些你認為能付諸實踐之處。這一切均有賴你的冷靜判斷。」[45]

---

43 〈劉制台來電〉（1900 年 6 月 19 日），收入苑書義等主編，《張之洞全集》第 10 冊，卷 234，頁 7994。

44 〈索爾茲伯理侯爵致代總領事霍必瀾電〉（1900 年 7 月 27 日發自外交部），頁 140。

45 原函：“The dangers from precipitate action have to be weighed against the risk of being too late.…” His instructions concluded soberly, “Policy of Her Majesty’s Government must largely depend on your report as to your views and what you consider practicable. They rely much on your cool judgment.” Admiralty to C.-in-C. , tel. 122 of 27 July 1900, Adm. 116/117. Cited in L. K. Young, *British Policy in China: 1895-1902*, p. 176. 本節譯文另參考楊國倫著，劉存寬、張俊義譯，《英國對華政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頁 18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不過，西摩評估形勢後，於 8 月 3 日提出與霍必瀾同樣的要求——派遣三千名部隊至上海，[46]此舉反而讓英廷海軍部對中國督撫同意三千英軍登陸感到意外。為審慎起見，海軍部於同日立即發電詢問西摩：

> 請您電告，我們的理解是否正確，即目前可派三千名部隊前往上海，並可獲得總督的同意在該處登陸。如果是那樣，它使局勢變得簡單了，並且比在遠處（例如威海衛）留駐部隊要更好得多。[47]

西摩是這樣回覆的：

> 正確的理解是：已獲得總督的同意，目前可派三千名部隊在上海登陸。總領事正要求總督發布告示使中國人確信：他們登陸只是為了防守租界。[48]

事實上，英官扭曲了李、劉、張等督撫的原意。督撫們由始至終只容許最底限度的英軍進江保護長江沿岸既有商務，但拒絕數千英軍駐紮上海之議。劉坤一的態度是清晰的，他希望羅豐祿向英國外交部「相機進言」，陳說以下「利害」——「我保疆土，彼保商務，毋為武員所愚」。[49]翌日，劉氏即致電羅氏，要求他「商外部，乞大力主持」，另一方面則派兵至滬，阻截將要入江的英印軍隊。[50]

至 8 月 13 日，霍必瀾在回覆莎侯電函時，再次明確指出，兩江總督表示同意讓三千英軍登陸。他並在信末補充稱：

> 本月 13 日，道臺在一個告示中正式同意我們占領上海。他在告示中

46 〈海軍中將西摩爵士致海軍部電〉（1900 年 8 月 3 日發自南京），頁 156。

47 〈海軍部致海軍中將西摩爵士電〉（1900 年 8 月 3 日發自海軍部），頁 158。

48 〈海軍中將西摩爵士致海軍部電〉（1900 年 8 月 5 日發出），頁 158。

49 劉坤一致李鴻章、盛宣懷、張之洞密電：〈江督劉來電並致盛京堂鄂督〉（1900 年 8 月 9 日），見顧廷龍、葉亞廉主編，《李鴻章全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第 3 卷，頁 1068-1069。

50 劉坤一於 1900 年 8 月 10 日接獲盛宣懷、李鴻章、劉坤一、張之洞電文後，即作出相應行動。見〈盛京堂呈電並致江鄂督〉、〈江督劉來電〉，均收入顧廷龍、葉亞廉主編，《李鴻章全集》第 3 卷，頁 1071-107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指出：中國人將分享這些部隊所提供的保護。[51]

然而，霍必瀾的言論是一廂情願的，也有誤導英廷之嫌。即使未能看到余聯沅告示內容，我們也能藉由前文引述的資料了解，中國官員對英國大軍壓境式的強制保護是有所保留的。浙江巡撫劉樹堂認為「今英艦兩隻，分泊甬、定，並派武職來寧」，是「與條款不符」，故發電李鴻章詢問原委，明言英方若是擅自行動，則無異於毀棄 6 月 30 日在上海簽訂的互保合約，視東南官員如無物——「直視我東南各省並無一人」。[52]

上述數言可見浙撫憤慨之一斑，但英廷並未能透過在華官員了解到有關實情。遠在倫敦的英廷內閣在霍必瀾等人一再敦促下，8 月 15 日終於向駐紮上海長江口岸的軍隊發出登陸令。此舉正如浙撫所言，公然違反東南督撫與各國駐滬領事 6 月底簽訂的互保條約。因為在《保護上海長江內地通共章程》九款草案中，第四款即清楚列明：「長江內地，中國兵力已足使地方安靜，各口岸已有各國兵輪者，仍照常停泊，惟須約束水手人等，不可登岸。」[53]

值得注意的是，在英廷簽發登陸令的當天（8 月 15 日），羅豐祿正好收到劉坤一要求他代為轉交給英廷的信函，而羅氏也在當天立即將之轉呈英國外交部。該函清楚指出：

> 我本人與西摩艦隊司令及霍必瀾領事之間關於派遣幾百名部隊在上海登陸一事，已經達成了令人滿意的協議。[54]

但不知是何原因，英廷似乎並未注意到部隊人數「幾百名」與「三千名」之別。

---

51 〈代總領事霍必瀾致索爾茲伯理侯爵電〉（1900 年 8 月 13 日發自上海），頁 173。

52 劉樹堂同時敦促各省要一律約束停泊江口的一、二英艦兵丁，「不可任便登岸」。見〈浙撫劉來電〉（1900 年 8 月 14 日），收入顧廷龍、葉亞廉主編，《李鴻章全集》第 3 卷，頁 1080。

53 〈盛京堂來電並致江鄂督蘇皖撫〉（1900 年 6 月 27 日），收入顧廷龍、葉亞廉主編，《李鴻章全集》第 3 卷，頁 960。

54 〈兩江總督致羅豐祿先生電〉（1900 年 8 月 15 日發自南京，同日由羅豐祿先生通知外交部），頁 18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綜上所述，我們除了知道英官對英廷和東南督撫屢次別有意圖地隱瞞外，也清楚看到，督撫們對於英軍登陸是有自身原則和堅定想法的。可以肯定的是，縱使局勢崩壞不堪，他們都不會把軍事主導權假手於外人。他們的應對措施是這樣的：在沿江出入口加建炮臺及派駐軍艦，並嚴格限制前來保護外僑或提供支援的英軍人數。劉坤一雖然比張之洞更積極聯英抗外，但對英軍人數仍有十分嚴格的限制，他在 8 月 9 日寄給盛宣懷的電文便清楚聲明「至多不過數百人」。[55]按當時在地日本人之觀察，劉坤一對於英軍派駐大軍之舉，「大為憤慨，視英人為蹂躪長江保護條約」。據說，西摩「忽然一翻前言，舉 3,000 人以上大兵，故而傷害劉坤一感情」云云。[56]

駐華英官向英廷刻意隱瞞與督撫限定的「四五百名之數」協議，[57]單方面把軍隊人數提高至 3,000 人。當盛宣懷、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獲悉後，即試圖聯手阻擋英軍入滬。但他們此時只能被動、消極地沿用聯夷制夷舊慣，接納劉坤一所說「得各國牽制方可阻止」的建議，[58]並各自「分電各國以期牽制」，[59]希望透過鼓動德、法、美、日諸國領事反制英國，使列強互動繼續維持均勢箝制。但是，此舉反加速招引列強紛紛仿效英國，援兵登陸。

---

55 盛宣懷，〈劉峴帥來電〉（1900 年 8 月 9 日），見氏著，《愚齋存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據 1939 年盛恩頤等刻本影印原書版），1572 冊，卷 38，電報 16，頁 196。

56 〔日〕神谷正男編，《宗方小太郎文書》（東京：原書房，1975），頁 94。轉引自戴海斌，〈「東南互保」之另面——1900 年英軍登陸上海事件考釋〉，《史林》2010 年第 4 期（上海），頁 129。

57 神谷正男編，《宗方小太郎文書》，頁 94。轉引自戴海斌，〈「東南互保」之另面——1900 年英軍登陸上海事件考釋〉，《史林》2010 年第 4 期，頁 129。

58 盛宣懷，〈劉峴帥來電〉（1900 年 8 月 9 日），見氏著，《愚齋存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1572 冊，卷 38，電報 16，頁 196。

59 盛宣懷，〈寄江督劉帥鄂督張帥〉（1900 年 8 月 9 日），見氏著，《愚齋存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1572 冊，卷 38，電報 16，頁 19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至此，東南中國局勢出現巨變的結果不難預見。霍必瀾、西摩既已向英廷虛報東南督撫容許英國派駐大軍的方案，而倫敦又簽發了登陸令，縱有督撫群起反對，早已駐紮吳淞江口待機而動的英軍隨即登陸上海。[60]督撫只容許上限「數百」保護英僑的英軍登陸原則，早被霍必瀾、西摩等人置之不理。

但有趣的是，8 月 4 日，莎侯將他在 8 月 2 日於下議院宣讀的英廷當前對華政策通告英國駐世界各國各地領事，重申英艦和部隊在長江流域一帶的角色是「盡可能地」同當地督撫合作，「平定騷亂和穩定秩序」；同時不忘強調，「女王陛下政府反對任何瓜分中國的行動」。不但如此，英國也不會左右中國的內政：「將來的中國政府，無論是由北京方面支配或實行地方分權，必須是中國人治理的政府。」[61]要之，莎侯公開表明其對華政策，英國目前及將來不會以武力侵犯中國，也不會操控中國的內政安排，同時也反對列強行相同之事。此政策清楚地勒令在華官員不得各行其是，免得破壞英廷的全域對華政策。莎侯一再謹慎處理揮軍入江問題和不願干涉中國內政，其目的就是不欲率先自毀「東南互保」格局，他最希望的仍是東南督撫能夠自行安穩轄區局勢。

---

60 英軍於 7 月下旬已在上海各江口佈置軍艦，但西摩等人評估有關軍力不足以應付形勢轉變所需。他認為目前「停泊在黃浦江的軍艦上的大炮火力和士兵」仍需再加上三千人——即「五千人便肯定足夠」。〈海軍中將西摩爵士致海軍部電〉（1900 年 7 月 31 日），頁 152。隨著形勢急劇變化，英軍也加緊完成在地軍力整合，英國海軍部於 8 月 3 日致英國外交部的函件便已指出：「目前駐吳淞的女王陛下軍艦是一支強大的力量。」〈海軍部致外交部函〉（1900 年 8 月 3 日發自英國海軍部），頁 155。8 月 9 日，劉坤一也注意到英軍在未通知中國督撫的情況下，已向上海「扎兵」，並聞「電調數千人」。另外，從劉氏以下數語「日前英雷艇入江，向其詰問，多方掩飾，繼又謂赴鄂送信，何以不用電報」，以及「英艦分泊各口，日見其多，淞申所泊洋艦廿餘艘，英為多，統計已不下二、三十艘」觀之，他所謂的「疑點」顯示，西摩在 8 月初已完成軍隊調齊任務，一俟倫敦登陸令下達，即於 8 月 18 日登陸上海，再加上英廷隨後從香港調撥而至的 3,000 名部隊，整體英軍人數遠超過督撫們能接受的上限。有關資料分別見：〈江督劉來電並致盛京堂鄂督〉（1900 年 8 月 9 日），收入顧廷龍、葉亞廉主編，《李鴻章全集》第 3 卷，頁 1069；〈海軍中將西摩爵士致海軍部電〉（1900 年 8 月 17 日發自上海），頁 182。

61 〈索爾茲伯理侯爵致龐士福特勳爵電〉（1900 年 8 月 4 日發自外交部），頁 156-15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直至 8 月 12 日，也就是在英廷下令軍隊登陸上海的前三天，莎侯答覆霍必瀾的電函時，還是一貫主張，語氣堅定地說：

> 在沒有得到這裏進一步的命令之前，除非遇有明顯的緊急情況，現在不要派部隊在上海進行登陸。[62]

不過，兩天後情勢卻急轉直下，事緣起於莎侯的休假。他於 1900 年 8 月 15 日開始休假，在暫離英廷中樞期間，他把處理中國政局的大任，交給內閣裏由三人組成的委員會代理，這三人為漢米爾頓（Lord George Hamilton, 1845-1927）、葛遜（George Joachim Goschen, 1866-1952）及萊斯頓（Henry Charles Keith Petty-Fitzmaurice, 5th Marquess of Lansdowne, 1845-1927）。可惜的是，莎侯這位年逾古稀的資深政治家，休假前的悉心部署和政策通令，並沒有如其所願地發揮功效，其內閣成員和在華下屬並未按其思想軌跡推動東南中國政局發展——藉以維持經營多年的龐大利益和勢力範圍。

按論者所言，英廷對華官員缺乏莎侯洞察全局的國際政治智慧和沉著等待時機的政治素養。[63] 8 月 15 日，漢米爾頓等人在莎侯休假期間，決定「占領上海」，而且有關決定是受霍必瀾及西摩之誤導下作出的。莎侯事後得悉，深感遺憾，並且嘗試力挽狂瀾。但是，海軍部的登陸令發出後，英軍已經進駐上海，繼之登陸的是法軍、德軍及日軍。英國致力維持多年的東南和局與勢力範圍，自此開始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脅。漢米爾頓 8 月 22 日向寇松坦承：

> 我們竟被上海的瘋狂分子如斯支配，甚至逼使我們遣軍進駐上海，為列強搶占原屬於我們操控的既得利益提供機會。（We allowed the hysterical element in Shanghai to so far dominate us as to force us to send troops to Shanghai giving the powers the chance to occupy where our interests predominate.）[64]

---

62 〈索爾茲伯理侯爵致代總領事霍必瀾電〉（1900 年 8 月 12 日發自外交部），頁 172。

63 L. K. Young, *British Policy in China: 1895-1902*, pp. 185-186.

64 Hamilton to Curzon, letter of 22 Aug. 1900, Hamilton Papers. Cited in L. K. Young, *British*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儘管莎侯曾在 7 月 27 日對西摩、霍必瀾等人作出如下嚴正訓言：「『在莽撞行動和後悔莫及的惡果』中小心權衡每個部署。」但一切似乎都朝著他不願見及的方向發展；而此前張伯倫所說「必須阻止主戰分子驅使我們同時與全世界發生爭執」，現實狀況卻是反其道而行。從漢米爾頓與寇松的通信中可知，英廷中的決策者在 8 月中後期為進占上海釀致的惡果感到後悔，英國在華南經營多年的龐大利益從此被列強瓜分，這一切都是英廷上下極不願意看見的。但是，由此反映的是，莎侯或張伯倫之大局觀與遠見，不但不為霍必瀾、西摩等遠在中國的外遣官員重視，就連他身邊的下屬也不盡認同。這一切進一步告訴我們，英廷內閣中有不少官員或其駐華官員，不甘於新時代伊始就在搶奪中國利權、瓜分中國領土方面位居列強之後。

從各種資料看來，倫敦方面基於各種限制，往往站在世界大局以及自身綜合國力等角度制定遠東策略，努力維持東南中國政治版圖原狀。遠離倫敦的英官因置身前線而急欲自保，在進攻是最佳防禦的意識下，自保之心愈切，則急欲軍隊救援之心也愈強。也因置身最前線，他們較上司更能洞察先機，親身感受到危機背後可供擴張的機會，致使他們在占據利益的步調比英廷更為急激，以至無暇與列強、當地督撫等保持良好互動，因為一切都比不上自身任內擴充勢力範圍來得重要。盛宣懷便認為西摩不惜窮兵黷武的舉措，就是要「立功長江」所致。[65]而西摩急於立功長江，還有一個較為深層的目的，就是「以泄楊村敗績之恥」。[66]

Policy in China: 1895-1902, p. 187.

65 盛宣懷，〈寄劉峴帥張香帥〉（1900 年 8 月 17 日），見氏著，《愚齋存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1572 冊，卷 39，電報 16，頁 207。

66 劉坤一致李鴻章、盛宣懷、張之洞密電：〈江督劉來電並致盛京堂鄂督〉（1900 年 8 月 9 日）指出：「有日本人向伊力言，英將西摩欲立功長江，以泄楊村敗績之耻」。見顧廷龍、葉亞廉主編，《李鴻章全集》第 3 卷，頁 1068。另按：「楊村敗績」是指西摩聯軍遭義和團及甘軍痛擊的一段史事。1900 年 6 月 9 日，屯兵大沽口的西摩二度接獲竇納樂從北京發出的求救電報，遂以八國聯軍統帥身分進軍北京救亡。但其所率軍隊沿途遇襲。6 月 16 日，聯軍給養中斷，西摩退守楊村待援，並於隨後數天慘遭義和團與甘軍圍攻，傷亡慘重，被擊斃 62 人，負傷 228 人。西摩於 6 月 26 日成功脫困，退回天津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與華南英官霍必瀾、西摩等人同樣急欲於亂局擴張以揚政聲的，還有港英殖民地政府總督卜力及其下屬。他們的轄地於各方面供應均亟需依傍粵省，且港粵兩地居民基本上可以自由進出，粵地任何局勢變化都將對香港造成衝擊。與華南英官不同，港督或駐港英軍司令等殖民地的全權統治者，比前者有更大行使權力的空間，但又不需如倫敦政府擔負顧全大局的權責與義務。他們更關心如何在亂局中保障轄區權益，並在眼界與能力可及範圍內擴充利權，最顯著的就是擴充自身管轄地面積和延展權力範圍。1900 年前後，港英政府陸續驅走駐紮九龍城寨的中國軍隊，占領九龍與新界，並順勢在 1899 年中葉與 1900 年間進兵深圳，欲將之一併劃入殖民地界域。已為不少辛亥革命或孫中山（1866-1925）研究者注意的「兩廣獨立」計畫，其實就是港英政府眾多擴充殖民地邊界的計畫之一，也是英人欲擴張其在東南中國勢力的意圖所在。

四、「兩廣獨立」的政治算計

庚子年這一年，港英政府與英國駐廣州領事館乃至上海的霍必瀾等人，因應中國各種變局而合作緊密、互通情報。「兩廣獨立」計畫的出籠，與華北、華南相繼出現的大變局息息相關，並且是駐華英官，包括港府主政者在內的各方面人物通力合作所致。同時，不可忽略的還有與港督卜力乃至港英政府關係友好的香港華人領袖、立法局議員何啟（1859-1914），他是整項計畫的關鍵人物。

眾所周知，何啟是孫中山就讀香港西醫書院時的老師，彼此建立深厚師友之誼，他也一直大力襄助孫中山的革命事業。按馮自由（1882-1958）記載，何啟率先向港督卜力提出有關計畫，在取得共識後，便與孫氏在港心腹陳少白（1869-1934）商議，後再由陳拍電報告知孫中山。

界。是次軍事行動以失敗告終，一般認為是西摩過於輕敵所致。詳見廖一中、劉海岩，〈西摩〉，收入林增平、李文海編，《清代人物傳稿》（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下編，第 3 卷，頁 389-39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孫「得電大喜」，[67]遂決定離開日本，儘快回港參預其事。孫在前赴香港的「佐渡丸」輪船上，對革命同志宮崎寅藏（1871-1922）說：

> 日前我有一個朋友××曾和香港××秘密會晤，商議了一件事。（太守）想使李鴻章據兩廣宣佈獨立（當時李為兩廣總督），用我來施行新政，他（香港太守）暗中作保護人保證安全。他曾以此事勸李。李為了晚年有所回憶緬懷，也有意獨樹一幟，因此表示贊成。[68]

文中前者××應為何啟，後之××為香港總督／太守。綜上所述，可知「兩廣獨立」計畫最初的提倡者就是何啟，並在卜力積極回應下醞釀出爐。

涉及此項計畫的三位主角中，孫中山最無政治包袱。相較之下，卜力與李鴻章的限制與計慮較多，他們願涉事其中，正顯示各有深層用意。不過，李鴻章如何看待或評價有關計畫，由於其未留下片言隻語而難知究竟。只是，說他以古稀之齡與「逆賊」合謀顛覆朝廷之計，似乎不是他這樣的「忠臣」、老臣所為。儘管有關事宜全由其僚屬劉學詢（1855-1935）代為操刀，但他顯然默許此項計畫進行。對此，論者多將之視為李氏本人在動亂不明局勢下，為自己留下退路之表現。[69]至於卜力，他願為此事作擔保人和出面推動，既違離倫敦保持中國均勢政策，又以非駐粵使節的局外人身分干預中國內政，其行事動機、勇氣乃至政治資本都不可小覷。可惜，我們同樣難從他本人親身說法中找到蛛絲馬跡，目前只能從當時與其交手者之回憶了解他們的政治籌算。有關人等留下文

67 馮自由，〈孫總理庚子運動廣東獨立始末〉，收入氏著，《革命逸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第 4 集，頁 92。本節關於何啟向卜力提出的籌謀以及孫中山「得電大喜」的確實時間不詳，應該是發生在 1900 年 6 月初，詳見陳錫祺編，《孫中山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91），上冊，頁 204。

68 〔日〕宮崎寅藏，〈在「佐渡號」船中〉，收入宮崎寅藏（滔天）著，林啟彥譯，《三十三年之夢》（廣州：花城出版社，1981），頁 214。

69 桑兵，〈庚子孫中山上書港督卜力述論〉，收入林啟彥、李金強、鮑紹霖編，《有志竟成——孫中山、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香港：香港浸會大學人文中國學報編輯委員會、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2005），下冊，頁 60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章可供援用者，陳少白、宮崎寅藏是僅有的二位。陳少白這樣憶述：

> 庚子年五月，北京入了聯軍的手，兩湖總督張之洞、兩江總督劉坤一、兩廣總督李鴻章，都按兵不動，不聽勤王命令。當時在香港我們有一個老師——大律師何啟，……他私下與我商量，使我們借重香港總督之力，勸李鴻章獨立，他願意代說香港總督轉勸李鴻章，我想這樣辦法總算一個機會，就寫信告知孫先生，後來也得了他的同意。當時李鴻章幕下的要人，有劉學詢、曾廣銓二人，都是熟的，就使人約請他們從中助力，他們甚以為然，答應相助；又由何啟擬一英文稿，由全體會員署名，送與香港總督，大旨說：兩廣盜匪徧地，人心惶惶，若聽李鴻章離開廣州而北上，則兩廣必危，後患不堪設想，香港密邇兩廣，必受莫大之影響，體察大勢，應請轉勸李鴻章停止北上，際此中央無主，正宜諷其據兩廣，宣告獨立，以維治安。當時香港總督和中國人感情極好，他受了何啟的運動，又接到這封信，倒很同意，也就修了一封信，由沙面領事轉交李鴻章，委委婉婉說明此意。[70]

陳氏指出，此項「獨立」計畫是在李鴻章 6 月 15 日被召上京的消息流出後，由何啟依次與卜力及陳少白（並電告孫中山）輪番交流，隨後再撰寫一封正式函件，呈請卜力出面轉交李鴻章。不過，陳氏分析略嫌表面，不足以說明卜力願意為冰炭不容的孫李兩派充當調人的深層原因。這或與陳氏基於自己的身分和所處位置，而不願將某些事說得太明白有關。

另一涉事者宮崎寅藏則深刻道出卜力的算計：

> 香港（太守）在義和團事件初期，欲推動李據兩廣獨立，擁護孫執掌政權這個企圖，實在可以說是一個別開生面的計畫。（太守）認為若能控制兩廣於自己的手中，則華南之事便不足為患，並可制先機於法國。進行的方法，莫過於拉攏李，如果李同意，則進行反清運動的力量在秘密幫會。因此必須拉攏孫逸仙，必須使李、孫握手。

70 陳少白口述，許師慎筆記，《興中會革命史要》（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6），頁 4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 如果李、孫能夠握手，則不費一兵一卒，兩廣即可獨立，而自己便可在上駕馭。[71]

卜力無疑比局外人更能預算箇中各種利益，只需推動李、孫合作，便可一舉數得：對內，香港不需再因革命派、維新派、秘密社團與兩廣政府間的爭鬥弄得雞犬不寧，便於治安管理；對外，亦可因控制兩廣內政而有助於未來進一步立足東南中國，在瓜分中國的呼聲中早著先機。卜力或推測卜力心思的宮崎，都已看到清廷的「力量已經不足以掌握中國」，宮崎更將卜力的算計視為與秘密幫會、義和團等同且相互制衡的一股力量而已：

> 換言之，在北京，各國皆為滿洲的保護者；在地方上卻極力同秘密幫會勾結。例如，當某國欲勾結義和團有所圖謀時，另外某國便結納地方大員以備萬一之變。如某國串通清廷有所企圖，則另外某國便結交秘密幫會，用以抗衡。也就是說，他們以北京為外交的角逐之地，以秘密幫會為萬一的退身之所。[72]

宮崎游走於日本政黨高層、亞洲各國反抗帝國主義武裝力量與中國革命及維新陣營間，對當時國際局勢可謂洞若觀火。他的分析讓我們看到卜力為了轄區利益和穩定局面而醞釀「別開生面」的計畫，並嘗試付諸實行。除了宮崎所言的巨大利益促使卜力有所行動外，即將擴散至華南地區的義和團排外運動也是卜力採取行動的重要誘因。擔憂時局不斷惡化的情緒瀰漫在當時大量駐華英官之間，何啟的建議不但可釋除卜力的當前疑慮，同時也可以為港英政府及英國政府帶來好處。

基本上，李、孫若於兩廣合作建立一個既脫離清廷，但同時又受英國人節制的新政府，對英國和香港而言，似乎都有好處。香港從此不再成為各方勢力與兩廣總督府之間的鬥爭緩衝地；同時，李鴻章鎮守的兩

71 宮崎寅藏，〈在「佐渡號」船中〉，收入宮崎寅藏著，林啟彥譯，《三十三年之夢》，頁 215。

72 宮崎寅藏，〈在「佐渡號」船中〉，收入宮崎寅藏著，林啟彥譯，《三十三年之夢》，頁 21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廣將有效抵禦義和團南侵，並於瓜分中國聲浪四起之際，讓英國據兩廣而占盡華南利權，最低限度也可讓英國在亂局中繼續經營「長江」和「西江」的利益。[73]

五、英人與李鴻章、孫中山的互動

港英政府一切考慮的重點和關鍵，其實都在李鴻章身上。李氏的超卓政績和管治能力，讓他的對手和港英政府官員留下深刻印象。李氏本奉緝捕康、孫二黨之命而南下，[74]但其督粵半年，盜賊亂黨止息而轄區得治的政績，頗讓各方讚嘆。在華北的拳民排外運動初興時，李氏率先表示反對；及其督粵，則警戒甚力，封鎖拳民排外之消息，也抵制清廷下達的「扶植拳民以抗外」的命令，並且恰當地處理廣東一帶的教案糾紛問題。[75]華南一帶的安危，是否出現針對帝國主義或殖民者的排外運動，對卜力而言極為重要，他了解到李氏正是穩定廣東局勢以及杜絕拳亂南下擴散的重要人物。

不過，當李氏於 1900 年 6 月 15 日接獲北上出任新職的廷旨時，卜力適值休假離港，其職權由陸軍少將加士居（William Julius Gascoigne, 1844-1926）署理。在庚子亂局下，加士居與卜力心生相同的危機感，懼怕漸已南下擴散的排外風潮不日波及兩廣，乃至影響香港民心穩定。加

73 Sir H. A. Blake to Sir Chamberlain, 2nd July 1900,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TNA): Public Record Office (PRO), CO 129/300, 以下簡寫為 TNA: PRO, CO 129/300。CO 為大英帝國殖民部（Great Britain Colonial Office）簡稱，此電文為該部與港英政府來往的函件，檔案編號 129。

74 黃鴻壽，《清史紀事本末》（上海：上海書店，1986），第 66 卷，頁 491。另見《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8)，第 7 冊，卷 458，頁 4197。

75 李鴻章治粵，首重剿匪肅治，不足半年便有成效。其政績、能力不只港英政府首腦，也廣為時人所認同。見李岳瑞，《悔逸齋筆乘》(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頁 5。此外，在庚子年初曾一度策劃暗殺李鴻章的保皇會主將梁啟超，亦不否認李氏治粵效績。見梁啟超，《李鴻章傳》（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頁 90-9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士居從轄區長遠安全角度出發，擔心李一旦離粵，局勢便會逆轉。他在獲悉李氏北上消息後，於 6 月 20 日致信張伯倫，希望張批准扣留李繼續留粵鎮守大局的計畫。[76]很明顯，加士居比卜力更早洞悉李若離粵可能出現難以預測的結果。由此推想，當銷假回港的卜力接納何啟所提的兩廣獨立方案時，應有加士居的支持。事實上，如果缺乏駐港軍隊司令支持，卜力不會輕率答應何啟籲請。

如何使李鴻章留下督粵，以及撫平李與革命派、維新派的衝突，將直接影響港英政府的管治和英國在華利益。上策固然是使李據兩廣而獨立，屆時不但康、孫兩黨反對慈禧太后的南方起事停止，也可使英國因成為調停者而操控華南大局。退而言之，讓李留守粵省，也能藉以遏止拳亂將至的各種危局。但問題在於該如何制止李鴻章北上，這問題使卜力頗費周章。從他的籌謀到行事方式，反映了一種與霍必瀾、西摩等無甚差別的心態，就是亟望英廷在排外危機下應事事早作籌算、盡占先機。在這種心態下，卜力向上司呈報的一些情報難以做到客觀持平。在他筆下，帶有濃厚親俄色彩的李鴻章一變而為親英分子，李氏與孫中山的合作態度也一再被渲染，甚而傳聞其不但樂見獨立政府建成，還有意在英國支持及保護下自立為皇帝或總統。[77]在 7 月 13 日的電報中，卜力更說李主動聯絡孫中山共同舉事，力求兩廣和平，甚至宣布兩廣獨立。原函是這樣說的：

> Li Hung-chang has entered into communication with Sun Yat Sen with a view to a junction with the Reform party. He has invited him to Canton, and proposes to arm the Reformers if they will join him in (?)

76 原函：“I have carefully watched the situation in Canton and its neighborhood and I am satisfied that there is no trouble so long as Li is there but I greatly fear result of his departure. I would suggest, if possible, he should be made to remain in Canton.” General Gascoigne to Sir Chamberlain, 20th June, 1900, TNA: PRO, CO 129/299.

77 原函：“Li Hung Chang is coquetting with this movement and there are remain that he wishes to establish himself either as King or as president.” Sir H. A. Blake to Sir Chamberlain, 2nd July 1900, TNA: PRO, CO 129/30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ecuring peace; he is quite prepared to adopt moderate reform. He wishes them in case the Emperor is alive to undertake to march with him to Peking if desired; this they demur at. If the Emperor is dead he would be prepared to declare the Two Kwangs a separate Government. This is my latest information. [78]

但是，必須注意的是，當李鴻章在 7 月 18 日過港與卜力會見時卻當面指出，即使慈禧太后做了一些愚不可及的事（had made many mistakes and had acted foolishly），但她無疑是中國最有能力的統治者（She was undoubtedly the most capable ruler in China）。然而，卜力對此只是很簡單地點到即止，筆鋒一轉就是再次交代自己希望李氏留粵的強烈訴求（advised him strongly to remain in Canton.）。[79]同樣的訴求，他其實在 7 月 13 日的電函中已經清楚陳明，他欲以「任何大騷亂都可能會釀成排外運動」為由，[80]試圖說服上司批准他扣留李氏。但是，其議於 7 月 17 日遭到張伯倫嚴詞拒絕。[81]除此之外，卜力與港府還要繼續嚴格執行 1898 年 8 月 20 日下達的驅逐孫中山禁令（the banishment of Dr. Sun Yat Sen from Hong Kong）。[82]孫中山既然不能進港，李、孫密會自然無從實現；而卜力、何啟等期盼的李、孫會商最終宣告流產，兩廣獨立計畫也

78 Governor Sir H. A. Blake to Mr. Chamberlain, 13th July, 1900, TNA: PRO, CO 129/300.

79 Governor Sir H. A. Blake to Mr. Chamberlain (Affairs in China: Reports interview with Li Hung Chang), 19th July, 1900, TNA: PRO, CO 129/300.

80 原函：“If Li comes to terms with the Reformers there will be peace in the South; but whatever the Reformers’ principles are, I am afraid any great disturbance may resolve itself into an anti-foreign movement.” Governor Sir H. A. Blake to Mr. Chamberlain, 13th July, 1900, TNA: PRO, CO 129/300.

81 原函：“…cannot sanction detention of Li Hung Chang or any interference with his movement.” Mr. Chamberlain to Governor Sir H. A. Blake, 17th July, 1900, TNA: PRO, CO 129/300.

82 這組函件被編在名為“Chinese Reformers”的檔案類別中，是外交部官員 Lucas（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eign office）發給卜力或港府所屬的殖民部密函（Secret and Processing），標題不確定，14th July, 1900 , TNA: PRO, CO 129/30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就止息於萌芽狀態。

上述所論，恰好反映港府首腦在當時欠缺類似莎侯、張伯倫等人的大局觀。蓋孫為清廷通緝之要犯，而李為清廷倚重之要臣，若港府容許孫在港登岸以及扣留北上主持大局的李氏，不但破壞英廷的全盤對華政策，同時也必招致列強責難。除此，這還反映出另外一個問題：英廷與列強、清廷、東南督撫甚至排外力量互動過程中制定的對華政策，卜力、加士居等並未鄭重相待。同時，對於李鴻章能為中國整體時局發揮怎樣的力量，也不是他們所在乎的。他們的態度與莎侯截然有別。

莎侯於 6 月 22 日獲知李鴻章即將離開廣州的消息，他並不反對李氏北上主持大局，只提醒李氏要先自評安全風險。[83]這種關懷顯示莎侯的政治家素養，有關注意人身安全的叮嚀其實只是出自老練政治家著眼於長遠合作關係的利益考慮。正如莎侯所言，李氏本人「對於是否有危險，一定會做出最好的判斷，因為他比我們更了解他自己的同胞」。他與前來告知有關消息的中國駐英公使羅豐祿一樣，毫不懷疑李氏的判斷力和駕馭亂局的能力。[84]事實上，莎侯是樂見李氏北上主持大局的，因為他將有助安頓大沽一役後的華北亂局，讓「危機得到解決」，緩和局勢並及時重拾社會秩序。就英廷而論，李氏如果不能順利履新，則列強將無足以代表中方的全權談判對象，李氏北上，即可在包括英國在內的列強監視下，為恢復中國秩序發揮功用。大局既獲支撐，則耗費國家貲財的軍事行動可望結束，這些正符合英國當前的全球軍事行動部署。至 7 月中旬，包括莎侯、張伯倫在內的英廷，必然了解時局正在急速惡化——「義和團運動正在擴大，並且可能在全國發展成為中華民族反對外國人的暴動」，[85]在這個時候，讓李鴻章北上主持大局，比 6 月中下旬就變得更具急切性了。

然而，不願李鴻章離粵的還有主導「東南互保」計畫的霍必瀾。他

83 〈索爾茲伯理侯爵致薩允格領事電〉（1900 年 6 月 22 日發自外交部），頁 50。
84 〈索爾茲伯理侯爵致竇納樂爵士函〉（1900 年 6 月 22 日發自外交部），頁 51。
85 〈代總領事霍必瀾致索爾茲伯理侯爵電〉（1900 年 7 月 14 日發自上海），頁 13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清楚指出李氏北上途經上海時，將為自己正與督撫們磋商的各種合作事宜徒添變數。[86]這些擔心促使霍氏於 7 月 19 日在未獲授權下，單方面急電本屬殖民部但又代表英女王行使在港權力的卜力，要求對方扣留仍未離港北上的李氏。[87]

的確，具鮮明親俄色彩的李鴻章在局勢失控之際北上，或可能受強俄及慈禧太后身邊的親俄派所支配，從而反為俄國在華競逐資本增加助力。儘管英廷不得不評估李氏北上的後果，但無意以武力強留李氏；這樣做，固然是要力避引起俄國、列強乃至李氏的督撫同僚反彈，同時也是收拾當前危局的唯一選項。

李鴻章謝絕莎侯的忠告而堅持北上，顯然對北方局勢走向及個人安危有一定掌握。他動身時已預料清廷將委派他為執掌實權的直隸總督，並兼全權議和大臣，其自信可在亂世謀國，並頗為得意地向人「自負曰：『舍我其誰也。』」[88]由是，其北上也就不是英國在華官員可阻止的了。他經過對大局作用及自身安全保障等的審慎考慮後選擇北上，其實正符合莎侯的期望——「恢復秩序及保障生命和財產」，使英國在華利益及駐華人員的安全得到保護。

李氏的自信基於他的個人威信與聲望，也是時人對他的期許。對此，當世名士費念慈（1855-1905）於 1900 年 6 月 30 日致盛宣懷的信函中，不但指出了這一點，也讓人得悉從「東南互保」到李氏北上路經上海，復至如何清除朝廷主戰派勢力等等，整個過程均是一眾督撫的共同決

86 Warren to Salisbury, tel. 43 of 14 July 1900. Cited in L. K. Young, *British Policy in China: 1895-1902*, p. 175.

87 霍必瀾原函：“In view of the spread of the Boxer movement & of the danger that the visit of the Viceroy Li hung Chang here may do much to upset the agreement at present existing with the Yangtse Viceroys, I urged upon Her Majesty’s Government the advisability of having a force ready either at Hongkong or Weihaiwei to leave for this port at short notice.” Pelham Warren to Sir H. A. Blake, 19th July, 1900, TNA: PRO, CO 129/300.

88 Warren to Salisbury, tel. 43 of 14 July 1900. Cited in L. K. Young, *British Policy in China: 1895-1902*, p. 175.

88 裴景福，《河海崑崙錄》（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卷 3，頁 22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策：

> 今日不清君側，無以上對列祖列宗，下謝天下萬國；稍遲則西人我先，國祚必亡，中原必裂，大事去矣。環顧大臣，舍合肥無足當此任者。然一日不揭曉，一日不能宣，當先即密為佈置；一旦揭曉，則申包胥以秦師至，此奇策也。但合肥總須駐滬，方可與謀，能致之否？現在惟有自保東南，聯絡與國，安集反側，清查土匪……猶冀北去而南存，為我大清留一虛號耳。[89]

可見，東南在地英官擔憂李鴻章北上會阻撓「東南互保」格局、卜力欲逼其留粵推行兩廣獨立，無不反映英官過於一廂情願，也顯示他們並未洞悉李氏之作為，均出於一群老練幹臣共同商議所得之結果。據論者研究所得，主張排外的廣西巡撫黃槐森（1829-1902），對東南互保一事不以為然。為阻止黃氏妨礙互保計畫進行的奏章上達清廷，劉坤一、張之洞、袁世凱等督撫本欲由榮祿留中不發，但由已北上途經上海的李鴻章挺身化解這場危機。[90]職是之故，英官擔心李途經上海將破壞東南和局的憂慮，是不了解李與東南督撫、榮祿等人的合作方針所致。基於此，李氏絕無可能接受卜力的建議，違逆職分與孫中山籌組叛離清廷和東南諸省的獨立政府，更不會因在地英官的勸服而自毀大局、自棄名聲。

從李鴻章、張之洞、劉坤一到榮祿等派系各異的大員，世變之際如何密商謀略、聯夷制亂，皆非霍必瀾和英廷可輕易捉摸，他們對張、李的印象有以下一些解讀：張對李的勢力、權位深感忌妒（deeply jealous of Li Hung-chang's preeminence），二人關係並不和睦；[91]其他英官認識的榮祿，只是一位保守排外、且與李氏政治態度不同之人。拳亂稍靖，竇

89 費念慈，〈費念慈致盛宣懷函〉（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初四日〔1900 年 6 月 30 日〕發自蘇州），收入陳旭麓等主編，李平子等編，《義和團運動：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七》，頁 103。

90 李國祁，《張之洞的外交政策》，頁 197。

91 At an interview with Chirol of The Times on 27 Jan. 1901. Intelligence Report, Hankow, sept. 1900-Jan.1901, F.O. 17/1442. Cited in L. K. Young, *British Policy in China: 1895-1902*, p. 18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納樂公使即要求英廷向清廷施加壓力，讓「現任閩浙總督許應騤代替榮祿」，獎懲之意甚明。[92]眾所周知，許氏正是「東南互保」一事的公開響應者，於 1900 年 7 月 14 日更主動聯同俄、美、英、日、法、荷、德等國簽訂「福建互保協約」，努力實行均勢互保之策。[93]

要之，在局勢愈趨嚴峻動盪的情況下，英廷關注的是如何盡可能維持英國在華的整體利益，以及平衡列強間的關係；相對而言，港督或部分駐華英官鑒於時勢惡化，更加注目轄下區域利益，以及如何在亂局伺機以動，透過擴張利權樹立政績。英廷對華政策未能得到在華英官良好配合的後果，其來有自。

六、各謀其利

「兩廣獨立」計畫胎死腹中，其失敗原因實未若我們想像的複雜。最關鍵的角色莫過於心繫華北的李鴻章，他一直在幕後靜觀時變，由粵商劉學詢代行其事。至北上過港途中的最後關頭——北上赴任消息經過逾三十天的「熱」處理後，早已傳遍列國使節和國中各階層，李已毋需顧忌任何的英國因素，更何況其已算是從英國勢力範圍內的華南全身而退。他在此時始公開表明堅決擁護慈禧太后和清廷的政治立場，足見其人行事處世方面如何深層計慮之一斑。7 月 19 日，他在離港告別港督卜力時，並不當面否定卜力和英廷一貫強調的「極盼皇上親政」意向，目的在顯示恢復秩序之決心；[94]如是遑論李要成為卜力口中的皇帝或總統。隨著道、咸、同、光四朝重臣李鴻章一走，籌議獨立政府之事便煙消雲散了。

返回歷史現場，孫中山當時仍是一介被朝廷緝捕的亡命之徒，李氏

92 〈竇納樂爵士致索爾茲伯里侯爵電〉（1900 年 9 月 10 日發自北京），頁 214。

93 李國祁，《張之洞的外交政策》，頁 206-208。

94 李鴻章，〈覆鄂督張〉（1900 年 7 月 21 日），收入顧廷龍、葉亞廉主編，《李鴻章全集》第 3 卷，頁 103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若真有「獨立」之心，亦不會紆尊降貴，與沒有實力的朝廷「逆賊」合作。[95]其次，李氏久浸宦海，在兩廣獨立的態度上一直曖昧不明，卜力撮合他與孫舉事，迨至事不成即欲以武力強行扣留。這些都可見卜力過於天真甚或傲慢的個性，他低估了兩位對手的能力，也反映置身庚子亂局中亟欲有所作為的卜力，其步伐比倫敦更顯急切的原因。李鴻章、張之洞等人的聯夷制亂方針，讓卜力、霍必瀾難於擴張活動空間。張之洞曾向不太認同「東南互保」的同僚解釋其經略，清楚闡明用心所在：

> 此時，英顧惜長江商務，我只可虛與委蛇，不宜決裂，有損無益，留東南數省尚可接濟京師，安靖北五省人心，即或西幸偏安，尚有地步。東南若潰，北方束手。如將來洋人必欲全吞中國情形已露，彼時再作孤注，聊盡此心，此時萬不宜也。[96]

「虛與委蛇」一語，體現幾位久經歷練的老臣焦灼謀國的用心，他們在內外交困之際忍辱負重，每一步棋都走得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他們清楚，只有東南連成一氣，借助占有最多東南中國利權的英人力量，才能有效地安內攘外。「以夷制夷」、「羈縻牽制」的聯夷制亂手段，在這一年再度被用以跟列強周旋爭逐。梁啟超（1873-1929）便曾這樣評述李鴻章之外交手腕：

> 李鴻章之手段，專以聯某國制某國為主，而所謂聯者，又非平時而結之，不過臨時而嗾之。蓋有一種戰國策之思想，橫於胸中焉。觀其於法越之役，則欲嗾英德以制法，於中日之役，則欲嗾俄英以制日，於膠州之役，則又欲嗾俄英法以制德……。[97]

李氏默許非官場體制內的社會人士劉學詢與港英政府接洽，從醞釀「兩

95 論者就此已有詳細論述，本文毋須再贅言。詳見邱捷，〈孫中山上書李鴻章及策動李鴻章實行「兩廣獨立」新探〉，收入氏著，《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與清末民初的廣東》（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頁 22。

96 〈致江陰李欽差蘇州鹿撫台〉（1900 年 6 月 25 日），收入王樹枏編，《張文襄公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90），卷 160，電牘 39，頁 840。

97 梁啟超，《李鴻章傳》，頁 7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廣獨立」計畫乃至「東南互保」協約的簽訂，都可以看作是李氏及督撫們借外力以求生存的外交手段。同樣，李氏慣用的「臨時而嗾之」手段，於庚子年亦被轉用於內政。透過借力使力，拉一派打一派之法，先拉攏孫中山這股海外活躍力量，向被后黨深惡痛絕的康有為亂黨實施暗殺行動。事成固可，事敗亦可用以離間康、孫兩黨關係，同時杜絕或推遲兩黨聯合起義的可能性，儘量使轄境免遭兵災人禍。[98]要言之，張之洞用以對付列強的「羈縻牽制」之法，也體現在李氏對付國內叛亂分子，其分際只在於對象之不同。

是故從「東南互保」到「兩廣獨立」，當中自有李氏本人深層自保目的。正如不少論者已注意到的，他與張之洞等人巧妙解讀廷旨，合理合法化互保計畫，使「各盡其職守之所當為，相機審勢，竭力辦理，是為至要」、[99]「力保疆土，如有疏失，惟各該督撫是問」等廷旨，成為抵抗亂命的憑據。[100]值得注意者，李雖沒在條款上簽名，但他在互保計畫中仍然擔負不可忽視的角色。時人即有劉坤一、張之洞「計無所出，問於李鴻章」之說。[101]至於籌設「兩廣獨立」，他先是不置可否，一俟朝廷情勢明朗、自身生命不受拳亂威脅後，即北上履新。李鴻章的曖昧態度源於以下因素：第一，北廷局勢未明；第二，列強瓜分中國之聲四起，這些均使其不立即斷然拒絕英人，亦未向外表明欲「獨立」的態度。就在他與卜力接觸之際，仍有效地推遲革命派暗殺行動；於其北上不久，果然發生惠州起義及其後任者德壽（?-1903）險遭史堅如（1879-

98 桑兵則另從李氏督粵而缺乏兵力對付保皇會及革命黨的角度指出，李實際上是利用孫中山對付康有為，以分化反對勢力，此為其一貫方針。詳見桑兵，〈庚子孫中山上書港督卜力述論〉，收入林啟彥等編，《有志竟成——孫中山、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下冊，頁 610。

99 〈軍機處寄李鴻章等電旨〉，收入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義和團檔案史料》（北京：中華書局，1959），上冊，頁 187。

100 〈軍機處寄各省督撫等電旨〉，收入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頁 187。

101 李希聖，《庚子國變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據上海圖書館藏 1923 年抱冰堂刻本），446 冊，頁 45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00）暗殺等事。

要言之，李氏毅然離粵北上，是因已掌握局勢發展走向。無甚掛慮之下，他路過香港時，嚴正表明立場，不惜當面敦促卜力防範及嚴懲「亂匪」，更以「轉守為攻」態度指出「廣東和平的主要危險來自香港」，因這個殖民地充斥了三合會徒和其他「危險人物」。[102]由此可以看到，李遏制內亂之心一直未變，而剿殺康、孫之心亦未動搖。畢竟，他靠彈壓內亂之往績而裂土封侯。準此，所謂「獨立」，不過是李氏眾多政治障眼法之一，是或懷柔或誘捕孫中山，或推遲康、孫於兩廣起義的計謀所在，同時也是自己得以在各種亂局中全身而退的策略所在。[103]

其實，李鴻章 6、7 月間與卜力、革命派等人交涉時，同時花費更多心力與列強周旋。他一方面與俄國磋商，促使「俄國表示它願意保證中華帝國的完整」；一方面憑恃俄國的意願逼使英國同作表態，冀其採取與俄國相同政策，並透過羅豐祿詢問莎侯，可否在亂局中由英國促成各締約國發布「一項關於中國領土的保證……一項不尋求各自利益的宣言」。[104]可見，李氏不自限政治舞臺於廣東一隅，他同時放眼於世界，關心中國全域以及各種善後之法。

事實上，李、劉、張等封疆大吏擁戴慈禧太后的基本政治立場未有改變。在排外風潮極盛的 7 月下旬，他們一方面相機審勢，周旋於列強、

102 卜力在會見李鴻章後的次日，向倫敦呈報會談經過，以下轉錄卜力筆下有關李氏談話的部分內容：“He…said that the principal danger to the peace and good order of the Canton province lies in Hong Kong, which is, he said, full of members of the Triad Society. …the Canton provinces have driven many dangerous characters to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He further stated that an expedition of thirty thousand men is being prepared in Singapore and Hong Kong for a disturbance in the Canton province some weeks behind.” Sir H. A. Blake to Mr. Chamberlain (No. 27365- Affairs in China: Reports interview with Li Hung Chang), 19th July, 1900, TNA: PRO, CO 129/300. 另見史扶鄰著，丘權政、符致興譯，《孫中山與中國革命》上卷，頁 143-147。

103 內田良平認為這是李鴻章的懷柔手段，透過吸納孫而免卻他與「康有為一致行動」。見陳錫祺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頁 213。

104 〈索爾茲伯理侯爵致竇納樂爵士函〉（1900 年 7 月 6 日發於外交部），頁 12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拳民和革命黨、維新陣營之間；一方面煞費苦心地為慈禧太后向列強開脫其拳亂罪責，把發動仇外運動的責任全數推給端王載漪。這樣做不但出於護主之心，使慈禧太后免受列強追究，同時也要確立他們在清廷與列強交戰事上保持中立態度之理據。借用論者之言，如慈禧太后要為戰爭負責的話，則表明她一直擁有控制朝政、時局的權力。[105]若非如此，不但端王僭位之說不能成立，他們也將背負違逆慈禧太后的罪名，進而目送慈禧太后受列強懲處，不忠不孝之罵名不是這幾位身受數朝皇恩的督撫所願承擔者。1900 年 7 月 23 日，張之洞收到莎侯的電文，了解到英國與列強未有「瓜分」中國之意，遂趁機聯同李、劉撰寫一份聲明，交霍必瀾轉呈英廷。這封函件除了感謝英廷「安輯民心之美意」外，通篇主旨便在於表現他們擁護慈禧太后和清廷的決心，不容許英國或列強侵犯「仁慈明哲」的太后，明白表示對慈禧太后的忠心和支持。[106]

此外，李鴻章及其同道都清楚知道，只要拳亂不擴及東南，列強便無法瓜分中國，蓋「互保」條約也只是一時有效，只為目前北方局勢而存在。用盛宣懷或一眾督撫慣用之言，就是「內亂一平，外釁自解」。[107]待北方局勢稍靖，「兩廣獨立」更無存在空間。綜合前文各種舉證，我們甚至可以說：從簽訂互保條約到李氏最終北上，種種結果都不能排除東南督撫與內廷實力派榮祿共同磋商之元素，[108]而港府高層的計畫也反被李氏用作全身退離華南之法。

---

105 L. K. Young, *British Policy in China: 1895-1902*, p. 179.

106 〈鄂督張來電〉（1900 年 7 月 24 日）、〈覆鄂督張〉（1900 年 7 月 25 日），皆收入顧廷龍、葉亞廉主編，《李鴻章全集》第 3 卷，頁 1036、1037。

107 盛宣懷，〈盛宣懷致奕劻、榮祿、王文韶電〉（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七日〔1900 年 7 月 13 日〕發自上海），收入陳旭麓等主編，季平子等編，《義和團運動：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七》，頁 123。

108 譬如說，當得悉李鴻章獲委為全權大臣後，劉坤一即發賀電說：「恭賀全權大喜。旋乾轉坤，熙天浴日，惟公是賴。中國之福，蒼生之慶，祈展布方略，迅速施行。」見〈江督劉來電〉（1900 年 8 月 10 日），收入顧廷龍、葉亞廉主編，《李鴻章全集》第 3 卷，頁 1071-107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再以李氏北上為例，盛宣懷是與列強簽訂東南互保條約的推手，其致奕劻、榮祿、王文韶的密電中顯示：

> 趁此功夫，莫如內外合謀，自行分別妥辦，尚可挽救。然非王爺與中堂獨對切陳，請兩宮速發密詔，外臣無從助力，即李中堂遵旨北來，亦同歸於盡。如當聖意須將暴軍調出禦敵，聶軍調京護衛。李相日內抵滬，如有密旨，即可北渡，宋、聶兩軍暫歸調度，……此電與江、鄂、閩粵各帥往返電商，意見相同，但疆臣不敢顯言。……如有密旨，請用虎城電碼，分遞濟南、保定遞上海道分轉最妥。[109]

可知英官未洞察對手上下一致的深層籌謀與政治態度，同時也反映他們自身籌謀未能實現的原因；至此，亦可明白李氏不重視與他交涉的英官的原因。他本人毫無留粵之意，正源於其急與同道施展當前連串籌謀，故有所謂「過港與英督略周旋即行」之說。[110]

究察李氏之意志堅定與臨危不亂，蓋與其深刻認識英廷當局對華政策有關：「英政府注意專在平匪保全英民性命、產業，絕無乘機強令中國變易政體、家法之意。至於索償索保護，自在意中。」[111]既無「變政體」之行，又有維護中國「主權獨立」、「領土完整」等政策，則「兩廣獨立」或「東南獨立」都不是英廷所願看見的，亦非列強所能認同。李鴻章深諳箇中究竟，遂靜觀其變、伺機而動，是以港督或其他英官的舉措並不能左右其抉擇或去向。

在此，我們不可忽視的還有孫中山陣營在這連串事態中的舉措和籌算。孫中山及其革命同志不但清楚卜力的兩廣獨立謀劃，也認識到李氏並非可共同合作者。孫一開始便與人談論卜力道：「香港總督之說係擴

109 盛宣懷，〈盛宣懷致奕劻、榮祿、王文韶電〉（光緒二十六年六月十七日〔1900 年 7 月 13 日〕發自上海），收入陳旭麓等主編，季平子等編，《義和團運動：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七》，頁 123。

110 〈寄盛京堂〉（1900 年 7 月 16 日），收入顧廷龍、葉亞廉主編，《李鴻章全集》第 3 卷，頁 1025。

111 〈寄東撫袁〉（1900 年 6 月 23 日），收入顧廷龍、葉亞廉主編，《李鴻章全集》第 3 卷，頁 94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大英屬領土利益範圍至兩廣之計略。」[112]對於李，孫也是一開始即不抱任何期望，且對其戒心甚重，其言曰：「李無理議之信念，復無觀察大局之眼識，年已垂暮，功名亦非其所深願，故雖有港督之諫止，當必為李所不容。」[113]儘管如此，孫接到陳少白電報後大喜，無非是看到一個意想不到的突圍時機可供利用，使其既能尋求與李籌組兩廣獨立而致的可能利益，又可在合作幌子下加緊籌劃惠州起義行動。

進一步言，從卜力到李鴻章，其實同樣低估了孫中山順水推舟之計。首先，孫走投無路之際，欣然應邀回國議事，不但有機會衝破禁令，踏足故土，還獲取李鴻章陣營開出的十萬兩巨額旅費津貼。然及至香港，孫為免誤入誘捕陷阱而另有籌謀。1899 年 11 月間，李鴻章、劉學詢曾多方詢問委託孫氏捕殺康有為的意願，使他不得不謹慎從事。[114]最後，孫中山委派宮崎寅藏等享有外交保護權的日本同道前往磋商，自己則徑直轉航越南，全力籌備惠州起義。值得注意的是，當李的幕僚劉學詢與宮崎寅藏等人會面後隔天，劉便派兒子把首期款項五萬兩先交給宮崎等人。[115]據說日本人一得到劉的款項後，有關李、孫合作的計畫頓時銷於無形。[116]職是之故，對於孫氏陣營而言，兩廣獨立會談不過是惠州起義

112 陳錫祺編，《孫中山年譜長編》上冊，頁 223。

113 孫中山，〈與宮崎寅藏的談話〉（1900 年 7 月 18 日），收入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第一卷，頁 197。

114 李鴻章動用包括他與榮祿等軍機政要的「虎城」密電系統，請孫中山緝捕康有為，以下僅選錄其中一、二節以觀究竟。1899 年 11 月 27 日，李鴻章致上海虎城電云：「孫已到否？康已離港否？究在何處？望查明隨時電知兩廣密捕是確。」見李鴻章，〈致上海虎城〉，收入顧廷龍、葉亞廉主編，《李鴻章全集》第 3 卷，頁 870。又 11 月 29 日另函劉學詢曰：「孫未覆，或尚遲疑。粵早奉電旨，難再飭緩。擬赴粵，有何辦法？」；11 月 30 日李再覆電使者曰：「用誘用擄，能生獲尤妙。……孫無來信，何也？」見李鴻章，〈致劉學詢〉、〈覆劉學詢〉，皆收入顧廷龍、葉亞廉主編，《李鴻章全集》第 3 卷，頁 871。

115 何漢威，〈廣東進士賭商劉學詢（1855-1935）〉，《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3 本第 2 分（2002，臺北），頁 334。

116 Marius B. Jansen, *The Japanese and Sun Yat-Se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籌劃過程中一塊掩人耳目的幌子，而那筆巨額路費也被用以購買軍資之用。[117]

卜力致力於穩定轄區秩序和領土擴張的努力是無庸置疑的。當他撮合李、孫商談兩廣獨立計畫告吹，拘禁李的要求被拒後，仍未見灰心。在面對革命派難以遏止的華南起義行動，他希望孫中山陣營能給他一點保證。而孫中山、何啟等人在「兩廣獨立」事敗後，聯名撰寫〈致港督卜力書〉，據說這就是「卜力向孫中山的代理人提出」的「一項替代性建議」，希望革命黨在發動起義時不會使列強為難，避免列強因騷亂而出兵的可能，繼續保障英國在華南的地位。[118]

對於孫中山、何啟等人而言，這同樣是個可供利用的機會，使革命派藉機向列強宣揚其行動綱領和長遠治國方略，向外界彰示其如何異於義和團的武力行動，如是既釋除列強疑慮，也強調他們重造中國的決心。孫、何等人力數十八項清廷暴政，陳示革命成功後革命派的治國方略與政治理念，期盼能夠藉此爭取外力支持。革命派並且表明了他們占取東南中國、徐圖北進，以至於最後建都南京的政體構想，其中不難看見處處以保障英國在東南中國利益為前提的用心，著意於爭取對方的體諒和給予軍事、財政支持。這些反映了他們在撰寫這封信函時，基本預設為從外人立場考慮問題，要求港督將之轉達英國當局，「懇貴國轉商同志之國」。[119]總之，這樣書寫的目的就在於使革命派的軍事起義得到列國諒解、支持和認同，藉此擴大活動空間。

1954), p. 245.

117 另據內田良平所說，這乃是孫中山「靠敵吃糧」、「因糧於敵」的策略。詳見邱捷，〈孫中山上書李鴻章及策動李鴻章實行「兩廣獨立」新探〉，收入氏著，《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與清末民初的廣東》，頁 22-23。

118 有關「上書」之經過及目的，可參見桑兵，〈庚子孫中山上書港督卜力述論〉，收入林啟彥等編，《有志竟成——孫中山、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下冊，頁 612。

119 〈致港督卜力書〉（1900 年 6-7 月間），收入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等編，《孫中山全集》第一卷，頁 19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七、結語

在巨大變局下，不同派別的政治人物有不同政治籌謀。即使是英國侵略者，英廷內閣與在華英官的對華舉措都是同中有異。不過，這些差異並不是表現在方向性問題上，而是表現在以掠取最大利益為前提下，「做什麼」、「怎樣做」和「何時做」的方法或手段上。要之，英廷內閣始終以顧全英國在華整體利益為其調整策略的行事方針，比在華英官更加謹慎，審時度勢，[120]不願因局部或區域利益招致更大範圍的損失。因此，英廷比任何一國更希望中國儘快恢復秩序，使列強返回談判桌上，結束沒完沒了的競逐。在英廷一再強調維持中國領土完整政策下，在華英官扣留李鴻章和欲藉之實現「兩廣獨立」的計謀無法獲得通過，而安格聯、金登幹等人所談論的「東南獨立」夢想也無法實現。

不過，在霍必瀾、西摩等人刻意誤導的「支配」性（漢米爾頓語）舉措下，英廷還是不慎放棄其維護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政策，反因最早大舉遣兵登陸上海，成為首批武力入侵者，促使列強軍隊亦步亦趨地緊跟其後登陸，使各國軍隊不得入江的「東南互保」協議瓦解。列強既已入江，英國在長江沿岸經營多時的利權和構築的勢力範圍也就受到威脅，使其於新世紀伊始即陷入既無力維繫均勢格局，又得不到盟友支持的尷尬局面。英國在近代中國喪失利權和影響力，庚子年遣兵入江登陸之舉大概可視為分水嶺。由此可見，英廷的這一外交對策無疑是失敗的；但亦隨其失敗，中國東南各地淪為列強的國中之國，國家主權盡為外人干預，百年國運之崎嶇多舛與此亦有重大關係。

總結而言，本文所論的「東南互保」、「兩廣獨立」事件中，可見

120 英廷的這一行事方針或對華政策，在庚子年已清晰體現，事實上也一直延續到 1920 年代與南方革命軍政府及北京軍閥政府間的互動。詳論請參考吳志華，〈香港總督的美意——港英政府對孫中山革命運動的態度〉，收入林啟彥等編，《有志竟成——孫中山、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下冊，頁 624-63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列強群起侵奪中國領土及利權的真實面目；同時，數位歷史人物的互動與交涉，也讓我們對該年的複雜局勢和相關人、事有更多了解。卜力、加士居與李鴻章、孫中山等人的互動過程中，除了突顯李、孫的機謀和英人對華政策的局限外，也讓我們看到庚子變局下政局波譎雲詭之一斑，反映不同勢力角逐政治利益時，運算籌謀之深層計慮。

*本研究得到香港特區政府研究資助局（項目編號：GRF Project No. 9041691）及香港城市大學中文、翻譯及語言學系（項目編號：CTL SSRGS）撥款資助。此外，本人很感謝匿名評審先生提供大量十分寶貴的修正意見，讓筆者獲益甚多。

（責任編輯：李佩蓁　校對：陳漢璋　楊可倫）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引用書目

一、文獻史料

《大清德宗景（光緒）皇帝實錄》第 7 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78。

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叢刊編輯委員會編，《中國海關與義和團運動》。北京：科學出版社，1959。

李希聖，《庚子國變記》，收入《續修四庫全書》446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據上海圖書館藏 1923 年抱冰堂刻本。

李岳瑞，《悔逸齋筆乘》。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1997。

李鴻章著，顧廷龍、葉亞廉主編，《李鴻章全集》第 3 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故宮博物院明清檔案部編，《義和團檔案史料》上冊。北京：中華書局，1959。

胡濱譯，《英國藍皮書有關義和團運動資料選譯》。北京：中華書局，1980。

苑書義等主編，《張之洞全集》。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

王樹枏編，《張文襄公全集》。北京：中國書店，1990。

梁啟超，《李鴻章傳》。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2000。

盛宣懷，《愚齋存稿》，收入《續修四庫全書》1572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據 1939 年盛恩頤等刻本影印原書版。

陳少白口述，許師慎筆記，《興中會革命史要》。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56。

陳旭麓、顧廷龍、汪熙主編，季平子、傅德華、吳民貴、陳宗海編，《義和團運動：盛宣懷檔案資料選輯之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

陳錫祺編，《孫中山年譜長編》。北京：中華書局，1991。

馮自由，〈孫總理庚子運動廣東獨立始末〉，收入氏著，《革命逸史》第 4 集。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9。

黃鴻壽，《清史紀事本末》第 66 卷。上海：上海書店，1986 據上海進步書局 1915 年版。

裴景福，《河海崑崙錄》卷 3。臺北：文海出版社，1966。

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合編，《孫中山全集》第一卷。北京：中華書局，1981。

〔日〕宮崎寅藏，〈在「佐渡號」船中〉，收入宮崎寅藏（滔天）著，林啟彥譯，《三十三年之夢》。廣州：花城出版社，1981。

General Gascoigne to Sir Chamberlain, 20th June, 1900,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TNA): Public Record Office (PRO), CO 129/ 299.

Governor sir H.A. Blake to Mr. Chamberlain. 13th July, 1900,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TNA): Public Record Office (PRO), CO 129/300.

Mr. Chamberlain to Governor Sir H.A. Blake. 13th July, 1900,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TNA): Public Record Office (PRO), CO 129/30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Sir H. A. Blake to Sir Chamberlain, 2nd July 1900,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TNA): Public Record Office (PRO), CO 129/300.

Pelham Warren to Sir H. A. Blake, 19th July, 1900, The National Archives of the UK (TNA): Public Record Office (PRO), CO 129/300

二、近人論著

王曾才，〈英國對華外交與門戶開放政策〉，收入氏著，《中英外交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79。

王覺非：《近代英國史》。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1997。

何漢威，〈廣東進士賭商劉學詢（1855-1935）〉，《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 73 本第 2 分，2002，臺北，頁 303-354。

吳志華，〈香港總督的美意——港英政府對孫中山革命運動的態度〉，收入林啟彥、李金強、鮑紹霖編，《有志竟成——孫中山、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下冊。香港：香港浸會大學人文中國學報編輯委員會、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2005。

李國祁，《張之洞的外交政策》。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0。

邱　捷，〈孫中山上書李鴻章及策動李鴻章實行「兩廣獨立」新探〉，收入氏著，《孫中山領導的革命運動與清末民初的廣東》。廣州：廣東人民出版社，1996。

桑　兵，〈庚子孫中山上書港督卜力述論〉，收入林啟彥、李金強、鮑紹霖編，《有志竟成——孫中山、辛亥革命與近代中國》下冊。香港：香港浸會大學人文中國學報編輯委員會、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2005。

楊國倫著，劉存寬、張俊義譯，《英國對華政策》。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1。

戴海斌，〈「東南互保」之另面——1900 年英軍登陸上海事件考釋〉，《史林》2010 年第 4 期，上海，頁 119-132。

廖一中、劉海岩，〈西摩〉，收入林增平、李文海編，《清代人物傳稿》下編。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1987。

〔美〕史扶鄰著，丘權政、符致興譯，《孫中山與中國革命》上卷。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0。

〔美〕萊特女士，〈辛亥革命的本質〉，收入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第 3 輯。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0。

Jansen, Marius B. *The Japanese and Sun Yat-se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4.

Joseph, Philip. *Foreign Diplomacy in China 1894-1900*.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Ltd, 1928.

Young, L. K. *British Policy in China: 1895-1902*. Oxford: Clarendon, 197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Historical Inquiry 49 (June 2012), pp. 65-109
Department of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Dynamics of Different Political Policies:
From Southeast Mutual Protection to Guangdong and Guangxi Independence

Chan, Hok-yin*

Abstract

This research explores the dynamics of the China policy discordance amongst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he British officials in China and the governors of Hong Kong Colonial Administration during the Boxer Rebellion of 1900. By focusing on how the British officials reached an agreement on "Southeast Mutual Protection" with viceroys and governors in the eastern and southern Chinese provinces and how they instigated independence for Guangdong and Guangxi by controlling southern Chinese provinces as their main aim, this research aims to understand: (1) The underlying reasons behind the passive reactions of the British government towards her own China policy in the Far East; (2) The political stance reflecting the complexities of the political climate of the time that the British officials in China held in dealing with the viceroys and governors in the eastern and southern Chinese provinces; and (3) The role that Dr. Sun Yat-sen had played when interacting with Blake and Li Hong Zhang and the political means he used during the Boxer Rebellion. The findings provide insight into the reasons why various actors demonstrated discord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hina policy and allow understanding of the real dynamics behind the causes of different political measures in the 1900s and the many complicated, underlying factors that affected them.

Keywords: East South Mutual Protection, Guangdong and Guangxi independent, Li Hong Zhang, Sun Yat-sen, Henry Arthur Blake, Marquess of Salisbury, Pelham L. Warren.

---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Translation and Linguistics of City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Tat Chee Avenue, Kowloon, Hong Kong SAR; E-mail: hokychan@cityu.edu.hk.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